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二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一〇年九月

元、明刊《居家必用》 與家庭百科的誕生

李仁淵*

一般對家庭百科的討論集中在晚明，然而元代建陽書坊出版的《居家必用》是中國已知最早分類輯纂家用知識的商業出版品。這種書籍類型以「家用」為主題收集文本知識，以類書形式編纂，並且刊印為商品，在市場上流通。此種內容、形式與流通方式的結合承繼了兩股宋代以來的潮流：文本大量流通促使分類知識參考書的商業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遷產生對家訓、蒙書等家庭相關文本知識的需求。在兩股潮流的匯集之下，同時亦出版各種參考書的元代建陽書商輯纂分類、簡化的家庭知識，讓這些文本更容易取得。不少宋元文本亦因這些參考書而得以流傳後世。

到了明代，司禮監刊印的《居家必用》被書坊大量翻印，取代元代以來多元的版本，成為後世流傳的定本。司禮監刊印之《居家必用》結構更為嚴謹，且更反映出理學影響下的理想家庭。「家庭百科」這樣的出版類型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現，而最早的《居家必用》仍持續重刊，但始終保持宋元之前的內容，未增添新材料，本身成為家庭知識的權威文本。

《居家必用》所開創的書籍類型與家庭知識的架構被後來的家庭百科所承繼，而這些家庭百科收集的文本知識及其蘊含的家庭理想，是元明以來家庭與宗族實踐之思想基礎的重要來源。

關鍵詞：居家必用 家庭百科 書籍史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以現存的資料來看，元代建陽書坊刊刻的《居家必用》是第一本分類輯纂家用知識的商業出版品。¹ 此書於元代出版後，在明代流傳甚廣，直到清代中葉仍有刊行。本文旨在討論此書在元明兩代出版的背景，以及這種出版類型的歷史意義。

《居家必用》對研究者來說並不陌生。學者看重此書常是認為這本書保留宋元時期的實用知識，特別是資料較少的蒙元時期。如王重民評價《居家必用》：

是書將宋、元間家庭社會實用書，多全部采入，賴以保存者不少。如丙集載趙師俠《拜命曆》、戊集載王旻《山居錄》、辛集載徐元瑞《習吏幼學指南》、趙素《為政九要自箴》，皆有用之書，久無傳本。又如《周書秘奧營造宅經》（丁集）、《百怪斷經》（丙集）等，雖無關實用，然有考於民風。至於各類之中，間載外族物品，如金、元、回回食品、化妝品等，蓋我漢族在被統治期間，其吸收外族文化，自較平時為劇，則是書之有資於考據者，不僅在幾部蓋蓋佚書已也。²

王重民從書誌學角度的意見與許多研究者相同。³ 後世學者對此書最常見的利用方式也是「有資於考據」，擷取其中部分作為研究宋元的史料。如書中〈吏學指南〉一節因為保存罕見的元代吏學知識，受到日本學者重視而單行出版，⁴ 而天野元之助則是將此書放在農書的類別中討論。⁵ 書中關於飲食的記載，亦被視為是研究蒙元飲食的重要材料。⁶ 許多學者認為《居家必用》最大的意義是「反映了宋元時期中國人的日常生活」。⁷

¹ 此書出版時有《居家必用》、《居家必用事類》、《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等稱呼，基本上是同一書的重刊、增改。除了指明特定版本，本文一律稱作《居家必用》。

²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347。

³ 如葉德輝：「其各集所載宋趙師俠《拜命曆》、孫偉《祭饗儀範》、《周書秘奧》、《營造宅經》，皆不傳之秘笈。苟非此書全錄，其文則亡佚久矣。過而存之，不且有功舊籍哉。」見葉德輝，《郎園讀書志》（收入王逸明編，《葉德輝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第3冊），卷六，頁22b-23a（總頁3-149）。

⁴ 日本東洋史研究會很早就以京都松栢堂寬文十三年重刻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摘出〈吏學指南〉的部分油印，一九四一年佐伯富依照此本做了索引。見佐伯富編，〈吏學指南索引〉，《東洋史研究》6.4（1941）：312-330。

⁵ 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書考》（東京：龍溪書社，1975），頁123。

⁶ 相關論文甚多，而其中的「飲食類」曾被摘出，收入「中國烹飪古籍叢刊」。見不著撰人，邱龐同注釋，《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飲食類）》（收入《中國烹飪古籍叢刊》，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⁷ 這類看法很普遍，如顧歆藝，〈《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176-196。

比起擷取書中記錄的文本知識，對此書整體性的評價最早可見酒井忠夫一九五八年具有開創性的〈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⁸ 此文創造的「日用類書」一詞後被學者廣泛運用，而酒井忠夫將《居家必用》放在「居家日用類書」一節，介紹本書的明刊本與書中內容，並很精準地指出家禮、家訓之風行對此書，以及此書對明代日用類書之影響。⁹ 吳蕙芳在討論從「日用類書」到「民間日用類書」的變化時，把《居家必用》視作是「傳統知識體系外的日用類書」，即與傳統類書的分類不同，更偏向日常實用，視之為晚明以來《萬寶全書》等更通俗之日用類書的前身。¹⁰ 兩人對此書的評價都有道理，惟兩人都未能見到元刊本，只能根據明刊本的內容來討論，而較少觸及本書在元代出版的背景。¹¹ 宮紀子在蒙元時期出版史的研究中多次引用元刊本的《居家必用》。惟《居家必用》不是她研究的主題，相關內容散見各處，僅作為其他書籍的佐證，而沒有完整的討論。且其研究專注在蒙元時期的出版樣態，對《居家必用》本身及其在明代以來的發展與影響沒有著墨。¹²

本文的取向是將《居家必用》視作是一種新的出版類型，即收集家庭領域需要的所有知識，分類編纂，以供讀者參考應用，直到現代仍有不同規模的家庭百科出版。在《居家必用》之前已有各種分類輯纂文本知識的類書出版，有取專門知識，也有意在全覽者，如受到許多研究者關注的《事林廣記》；然而此前這類的書籍並不以「居家」作為主題。不同類別的「居家知識」，如家庭禮儀、家用醫藥等等，在此前也有刊印成冊，但沒有收集所有不同領域之居家知識的出版意圖。不同領域

⁸ 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國土社，1958），頁 25-154。此文後來增補，單獨出版為《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2011）。

⁹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頁 210-213；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 131-136。

¹⁰ 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從《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氏著，《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2007），頁 11-54。

¹¹ 此外王正華雖然主要在討論「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但亦從現存的明刊本《居家必用》指出其內容著重鄉紳理家的需要，而與更反映出城市商業文化的《五車拔錦》等晚明日用類書有所差異。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2003）：19-20。

¹² 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8）。宮紀子已經提到應該注意元刊《居家必用》與現存明刊本、朝鮮本很不相同，但並未就此進一步展開討論。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627。

的居家知識可能在此前曾被抄寫在一起以為備用，但在《居家必用》之前沒有用刻印的方式商業販售。

換言之，從《居家必用》開始的家庭百科結合了書籍出版的三種層次。其一是內容上限定在家用的知識範圍內。其二是在形式上是「分類輯纂」的類書。其三是在生產流通方式上刻版印刷、商業販售。家庭百科這三種層次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可能有不同發展，都還可再細究。如不同時期的家庭百科怎麼定義所謂「家用知識」的範圍，是否反映出當時的家庭型態？不同時期的家庭百科在類書的形式上採用了什麼樣的組織與展示的策略？不同時期的家庭百科商業發行所針對的是什麼樣的買家、這樣的買家在家庭中的位置是什麼，為什麼會有購買這種分類家庭知識的需求？這些都是討論家庭百科不能忽略的重要問題。然而在此之前，本文所要探索的是首將這三種層次結合之《居家必用》產生的歷史脈絡。

某種類型的書籍在某個時期開始出現或風行，多具有相應的歷史意義。這類書籍的流行可能是順應當時社會、文化或思想在某個層面上的發展，或者是這類書籍本身推動了某種社會、文化或思想上的變化。研究者從文藝復興時期歐陸的政論與禮儀手冊，十八世紀晚期法國被查禁的色情、科幻與諷刺小說，晚明以來的善書、日譜與功過格，探究了不同時代書籍與思想文化的互動牽連。¹³ 而如《居家必用》等家庭百科在內容、形式與生產方式的相關討論，最後仍應放在元代以來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探討此出版類型的出現以及帶來的影響。

壹·《居家必用》在元代的出版背景

《居家必用》在元代建陽的出版文化中產生，然而許多學者對其在元代的出版情況並不清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居家必用》的描述是：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十卷。內府藏本。不著撰人名氏。載歷代名賢格訓及居家日用事宜，以十千分集，體例頗為簡潔。辛集中有大德五年吳郡徐元瑞

¹³ Jacob Soll, *Publishing The Prince: History, Reading, 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eter Burke,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W. Norton, 1995); Cynthia J.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王汎森，〈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1998)：245-294。

《吏學指南》序，聖朝字俱跳行。又《永樂大典》屢引用之，其為元人書無疑。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或謂熊宗立撰。恐未必然也。¹⁴

清初藏書家黃虞稷 (1629-1691) 的《千頃堂書目》收有十卷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認為是明代出版名家建陽熊宗立 (1409-1482) 所纂。¹⁵ 然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有元大德五年 (1301) 序之《吏學指南》，重刻本對聖朝跳行都未修正，而認為此書在元代出版。此段落說明不僅《四庫全書》編纂時已沒有看見元本，而只能推測是元人書，甚至清初福建知名的藏書家也不知道有元代的刊本。

確實《居家必用》元刊本因為留存不多，而且其書既無序跋也不知編者，故很少學者討論。目前已知留下來的元刊本均為殘本：(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元五年 (1339) 友于堂《居家必用》刻本存甲乙集，甲集前有「居家必用總目」。(2)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刻《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存壬癸集，其中壬集缺前數頁、癸集缺後數頁。(3) 安徽省博物館藏元刻《新增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十卷，存甲己庚三集。其中安徽省博物館藏本未能見到。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為楊守敬從日本訪得，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形制非常相似，同為十三行二十二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的版框為單邊，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初為雙邊而後為單邊。兩者都為雙黑魚尾相隨，然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魚尾為單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魚尾有單有雙。字體方面兩邊的俗字交相混雜，沒有一致性。在內容上，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壬癸兩集內容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甲乙集前的全書總目稍稍有所出入，有幾項大標題不在總目內。以目前的線索推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可能不出於同一版，且可能較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晚出。然而這種類型的商業出版品屢經重印，總目與內容不一致也不算少見，故難以下定論。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居家必用》甲集目錄末頁牌記刻有「至元己卯 (1339) 孟夏友于書堂印行」(圖一)，而甲集目錄、乙集目錄標題旁刻有「椿莊書院新刊」字樣。¹⁶《居家必用》書版中出現兩家書坊的名字，可能是書坊翻刻他坊、或使用

¹⁴ 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一三〇，頁 2b。

¹⁵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五，頁 15b。

¹⁶ 元代有兩個至元年號，且兩者都有己卯。一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 (1279)，一是元惠宗至元五年 (1339)。元刊本載有大德 (1297-1307) 年間事，故應為元惠宗至元五年。中國國家圖書館目錄作「至元五年」，即指元惠宗年號。吳蕙芳作元世祖恐誤。參考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1)，頁 28。

他坊書版的結果。¹⁷ 有這樣的現象，通常是因為該書暢銷、書坊趕印。此二書坊中的建陽吳氏友于堂曾於泰定元年（1324）出版詹友諒重編、劉應李編纂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¹⁸ 而椿莊書院也在元至順年間（1330-1333）出版《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¹⁹ 也就是說，在一三二〇至三〇年代出版《居家必用》的兩家建陽的書坊也相繼出版其他暢銷類書。

以家用知識為範圍的類書為何出現於十四世紀初的建陽書坊，可以從兩個方向討論。其一是宋代中葉以來商業書坊出版分類文本知識的潮流，其二是宋代以來家庭型態的變化以及對家用知識文本的需求。《居家必用》的出版可以視為這兩種趨勢在元代建陽的合流。

一・宋元時期分類文本知識的商業出版

類書的定義、種類、發展史等在書誌學中已經有許多討論。²⁰ 其最核心的定義應該是指收集已有的文本，重新分類輯纂的一種書籍類型。類書常常對原有的文本有所處理，或者摘要、或者節抄。否則收錄全文分類集結，若原文為短篇文本，常被視作是文選；若原文是長篇分卷的書籍，或被認為是叢書。另外編輯書籍時將文本依照類別分章卷，原是很普遍的行為，無論文集、醫書等，各卷常是同類文本的集結。只是對類書的編輯者來說，「分類」顯然是更重要的工作，無論分類的目的是要組織現有的知識體系，或是方便使用者查找需要的文本主題。而在實際應用上，類書的編者通常不預期讀者如讀一本文集般從頭到尾讀完一本類書，而是希望其編輯的努力可讓讀者依需要進一步利用這些文本。

類書之所以出現，即是因為有過多的文本流通，需要一本參考書來指引讀者接近這些文本，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則需要有一個分類架構來協助讀者定位。因此，一種類書的出現，常常是跟某個特定階層所能接近的某種知識領域所生產的文本數量相關，而文本的數量則常是決定於此知識領域的發展程度以及文本生產的方式。如研究者注意到，魏晉南朝興起對學術的重新整理，諸如集註、類抄、匯集眾

¹⁷ Lucille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60.

¹⁸ 全建平，《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頁 42-44。

¹⁹ 參考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550-552。

²⁰ 參考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書等，或與紙張的普及相關。²¹ 魏晉南朝是書寫載體從簡帛時代進入紙張時代的轉折點，從簡帛到紙張，意味著比前一個時代，文字更容易製造、也更容易流傳。大量增加的紙本文本不僅需要新的目錄之學加以分類，同時也需要一些「整理書籍的書籍」作為參考。同時比起簡帛，紙張也讓比對、抄集等工作更容易。編纂者可將意見書寫在字裡行間，不同來源的文字可以更容易的抄寫在一張紙上，因而集註、類抄等工作可以執行。一般被視為是類書的發端、由魏文帝曹丕命臣下集纂的《皇覽》，或許也在這樣的背景誕生，而到南朝則有更多由皇室所發動的類書編纂。²²

到了雕版印刷開始普遍的宋代，不同種類的印刷品更大規模的流通，讓當時的讀者感受到文本的無窮盡，以及文本參考書的重要。許多類書的編纂是出於對書籍與廣博知識的熱愛。如《錦繡萬花谷》佚名編者在淳熙十五年（1188）序中描述小時候居窮鄉，書本絕少，「文籍最為難得。苟可以假鬻，亦未嘗戛戛以盡其誠。以余有書之癖，每讀一篇章，如小兒之于飴劑有加而不能自止。當其劇時，雖夜分漏盡不之覺也」。而成人之後，「凡書有當存乎吾心者，輒稍招還其舊而聚其旅，二三年間抄益多」。後更「無以自娛，復留意於科舉之外。凡古人文集，佛老異書，至於百家傳記，醫技稗官，齊諧小說，荒錄怪志，聞必求，求必覽焉，久之浩浩如也」。因此他將這些抄來的篇章分類輯纂，「古今之事物，天下之可聞可見者，絜乎其有條矣」。最後感嘆，「夫是書獨可以自娛，而不可傳人。蓋天下之書不可盡，而余之心亦不可足。以不可足之心，而讀不可盡之書，其抄無既，其事無窮」。²³ 編者雖然強調早期抄書的緣故是因為「書本絕少」，但其實在他的一生中接觸到的書籍數量與種類可說已遠超過前代的普通讀者，並可以以個人之力集結出一套類書。

其他如閩北崇安出身的葉廷珪（1115 年進士）編纂《海錄碎事》、同樣出身崇安之祝穆（?-1255）編纂《事文類聚》，以及出身金華之潘自牧（1195 年進士）編纂《記纂淵海》等，都在自序中自陳對積纂書籍的熱愛。²⁴ 被眾多文本淹沒的宋

²¹ 胡寶國，〈東晉南朝的書籍整理與學術總結〉，《中國史研究》1（2017）：59-72。

²² 胡道靜，《中國古代的類書》，頁 40-42。

²³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4 冊），〈序〉，頁 1-2。關於此書的編者身分，見李致忠，〈《錦繡萬花谷》編者為誰再探討〉，《新世紀圖書館》5（2013）：74-76。

²⁴ 見田建平，《宋代出版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頁 767-782。

代讀書人，除了將所聚文本集結出版為叢書外，便是摘抄書中內容成為類書。這樣的工作在前一個時代可能皇室與高官才做得了，只有他們可以接觸到這麼多不同的文獻、找到能力足夠的人來進行大規模的編纂活動。然而到了宋代，就算是生平不詳的《錦繡萬花谷》的編者，也能一面感嘆書籍無窮盡，一面接觸到這麼多書籍，激發他們編纂分類文本知識的熱情。

從十三世紀開始，商業書坊更深入地介入類書的生產。商業出版發達的閩北與浙西成為文字流轉的節點，讓愛書人可以接觸到各種書籍。《錦繡萬花谷》的編者與編纂《記纂淵海》的潘自牧都出於衢州、金華，而編纂《事文類聚》與《方輿勝覽》的祝穆、《歲時廣記》與《博聞錄》的陳元靚，則都出身於閩北建陽、崇安。被追溯為第一部綜合性叢書、編訂於嘉泰元年（1201）的《儒學警悟》，其編纂者、出版者亦與建陽經營書坊的俞氏家族有所關連。²⁵ 前述《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等私纂的類書，後來都由書商出版而廣泛流通。由於這類書籍銷量佳，祝穆《方輿勝覽》自序後錄了嘉熙二年（1238）兩浙轉運司的牒文，說明「本宅見刊《方輿勝覽》、《四六寶苑》、《事文類聚》凡數書，並悉本宅貢士私自編輯，積歲辛勤」。由於雕版昂貴，為了防止「書市嗜利之徒」翻刻或出版節略本，故請發此牒，「出榜衢婺州雕書籍去處張掛」，以禁止其他書商盜版。²⁶ 而書商不僅出版私纂類書，更對受歡迎的類書加添內容。如《錦繡萬花谷》大受歡迎後，書商雜採其他類書，陸續推出後集、續集與別集，以致有多種刻本流傳。²⁷ 後來流傳的版本，已經與編者開始編纂的內容大不相同。

到了十三世紀中晚期，更有書商請專人來編輯類書。如序於寶祐丁巳（1257）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便是建陽書商劉德亨請當地文人謝維新所編纂。序中稱「兩坊書市以類書名者尚矣。曰《事物紀源》、曰《藝文類聚》，最後則《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出焉，何汗牛充棟之多也」。既然已經汗牛充棟，何以還再需要一部類書？序中由書名中的「合璧」、「備要」解釋：「昔人有不善記事，每求一事為之紬繹搜索，至有終日追思，而莫窮其所出者。今而是編，始而天文、地

²⁵ 田建平，《宋代出版史》，頁785-788。

²⁶ 葉德輝，《書林清話》（收入《叢書集成》第6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二，頁7a（總頁98）。

²⁷ 楊守敬，《日本訪書誌》（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2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卷一，頁32-33a（總頁63-65）；李更，〈《錦繡萬花谷》續書與《初學記》：南宋書坊「纂」書方式管窺〉，《古典文獻研究》15（2012）：288-319。

理，次而節序、人物，以至族屬、官職、姓氏之分，儒學、仕進、道釋、技藝之等，與夫吉凶、慶弔、冠婚、喪祭之儀，草木、蟲魚、器用、動什之末，莫不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其間別以標題配以合璧，俾閱是編者，求其一則知其二，觀於此則得於彼。既無摛摘之勞，而有駢儷之巧。如遊元圃而取瑤寶、入武庫而繕甲兵，則其有功於後之類書者多矣。」²⁸ 比起之前如《錦繡萬花谷》等書在序中強調編者個人積纂興趣，這本由書商托編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重點是「類而得其備，備而得其要」，讓讀者可以免摛摘之勞。換句話說，此書編纂的目的自始就是要成為讀者面對茫茫書海時的參考書。

入元之後，雖有短暫中斷，隨後建陽書坊的類書出版有增無減，並且範圍更為擴大。早期論及書籍史時常將宋、元分開討論，或者強調蒙古政權對文化與出版的戕害。然而近年來學者開始重視蒙古時期的開放性，時間上對遼、金、宋的承繼與在明代的遺緒，以及地域上對東亞的影響。²⁹ 從類書來看，南宋晚期與蒙元時期建陽類書出版的趨勢有相當的連續性。特別在元代恢復科舉之後，大量與科舉相關的印刷商品復興，而各樣類書也隨之新輯或重新出版。³⁰ 其中《事林廣記》內容豐富，且留存的早期版本較多，因此得到學者的關注。在十四到十六世紀之間《事林廣記》留下諸多版本，甚至在民間出版相對沉寂的明朝初年，都有重刻的紀錄，可見其風行程度。³¹ 在可以找到出版資料的版本中，從元代到晚明，雖以「書院」、

²⁸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9-941冊），〈序〉，頁1-2。

²⁹ 如張秀民經典的《中國印刷史》講到元代時小標題是「刻書衰落」，多處提到「民族歧視與壓迫」、「對知識分子的防範」、「不如宋刻」。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頁281-282。後來的學者修正了這種說法，或更強調蒙元色彩在出版文化上的影響。見田建平，《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Lucille Chia,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 284-328。值得注意的是，同樣肯定元代出版業的發展，宮紀子與 Lucille Chia 的歷史解釋有很大的差異。

³⁰ 參考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385-457。除了科舉與政府文化政策的影響外，高橋文治認為亦不能忽略南宋以來類書發展的延續，見高橋文治，〈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東洋史研究》65.3 (2006)：512-513。

³¹ 《事林廣記》目前已知出版年代、留存最早的版本是題為《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的元至順年間（1330-1333）建安椿莊書院刻本，與同為元至順年間的西園精舍刻本。隨後有元至元六年（1340）建陽鄭氏積誠堂刻本、明洪武壬申（1392）梅溪書院刻本、明永樂戊戌

「精舍」、「堂」為名，全部都是由閩北建陽等地的商業書坊刊刻，如劉氏、余氏、詹氏、鄭氏等幾個建陽重要的出版家族，都曾有刊刻《事林廣記》的紀錄。³²

近年來的研究也讓我們更了解《事林廣記》編纂者的出身背景與此書早先的出版情形。《事林廣記》最初的編者陳元靚是南宋崇安人，與建陽相鄰。據考訂在南宋嘉定（1208-1224）末即有《歲時廣記》出版，由建陽劉純與朱熹（1130-1200）的長孫朱鑿作序。而根據劉純序，當時陳元靚所編的《博聞錄》便已盛行於世。此書入元後曾以《新編分門纂圖博聞錄》出版，但一度因為未避諱、收入蒙古王室世系圖，以及部分天文、陰陽的內容而遭禁，在元大德年間（1297-1307）被書商以《事林廣記》之名重新出版。³³而現在留存的至順、至元諸本，都是再度新增之後的版本。從這些考訂可知，《事林廣記》可說是宋元明之際建陽書坊的產品。雖然始終仍掛著陳元靚的名字，然而南宋時期《博聞錄》的原貌已經不得而知。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樣貌，其實包含大量元代建陽書坊的創造，加入大量元代的文本。

至順椿莊書院本與西園精舍本的《事林廣記》在封面之後，刊載了一篇一模一樣的啟示。從這個啟示可以看出《事林廣記》的意旨：

《事林》一書，資於博物洽聞之士尚矣。道散天下，事無不該，物無不貫，其紀載容有能盡之者乎？是編增新補舊，是它本特加詳焉。收書君子幸鑒。椿莊書院謹咨。³⁴

對出版者來說，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幫助「博物洽聞之士」。此書有網羅天下事物的意圖，但也明白天下事物的記載無法窮盡，因此要出新編「增新補舊」。在商業出版的競爭底下，本版勝出的原因是因為收入內容更加詳盡，必須要特加說明，讓讀者注意到這一點。這樣欲窮盡天下事物記載的企圖也存在於寫本時代的類

(1418) 建陽翠巖精舍刻本、明成化戊戌 (1478) 建陽劉廷賓刻本、明弘治辛亥 (1491) 雲衢菊莊刻本、明弘治壬子 (1492) 建陽詹氏進德精舍刻本、明弘治丙辰 (1496) 建陽詹氏進德精舍刻本、明嘉靖辛丑 (1541) 建陽余氏敬賢堂刻本。另有日本長崎縣對馬歷史民俗資料館藏年代不明、但據信早於至順本之元刻本，以及以元泰定二年 (1325) 刻本為底本的元祿十二年 (1699) 和刻本。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王柯，〈《事林廣記》版本考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 (2016)：167-175；胡道靜，〈元至順刊本《事林廣記》解題〉，氏著，《中國古代典籍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³² 關於建陽的出版業與出版家族，見 Chia, *Printing for Profit*；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³³ 王柯，〈《事林廣記》源流考〉，《古典文獻研究》15 (2017)：342-352。

³⁴ 陳元靚編，《增新類聚事林廣記》（西園精舍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首頁。

書，然而多是由皇室推動的大型編修活動。在《事林廣記》的例子是書商幫助一般讀者來達成掌握世間文本知識的欲望。

除了《事林廣記》至少五種版本之外，元代建陽書坊尚出版許多整理文本知識的書籍。有些如《事林廣記》是舊有的書由不同書坊大量增補，有些則是新編纂的書。如由建陽劉應李編纂的《翰墨全書》（《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首先在大德十一年（1307）由建陽平礪伯氏出版，後於泰定元年（1324）由建陽友于堂出版改編版。³⁵ 最早完整留存為泰定元年（1324）本的《啟筭青錢》（《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則由日新堂出版，另外尚有亦在元代初年出版的《啟筭雲錦》（《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雲錦》）。《聯新事備詩學大成》分別於皇慶年間（1312-1313）余氏雙桂堂與至元九年（1349）建寧路書市劉氏出版之，日新堂在至正二年（1342）則出版《新編增廣事聯學大成》。³⁶ 而前述南宋的《事文類聚》、《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等書，也都在元代出了增補重編的版本，如泰定三年（1326）出版由富大用新增的《事文類聚》新集。這些新舊類書出版的時間如此集中，可說十四世紀的上半葉恢復科舉後，建陽書坊有一股出版類書的風潮。比起南宋的類書，這些類書更多不知道編纂者的名字，而更有可能是由書商輯纂。不少類書在短時間內由不同書商出版，冠以「新編」、「增廣」之名。或者如「事文類聚」、「群書類要」等書名在不同的內容書籍上被書商冠用。部分常用類書，如《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更有便於攜帶的巾箱本流通。³⁷ 這種在晚明習以為常的操作，在元代的建陽已相當普遍。

然而比起《錦繡萬花谷》、《事文類聚》等類書主要仍在收集文句，《事林廣記》收集的文本知識範圍更為普遍。從宋代以來，更多領域的知識由於雕版印刷的普及而進入版刻，甚至開始是由官方刻印推廣。除了與科舉有關的儒家經典與文章典故之外，諸如曆算、夢占、醫病、本草、農桑等知識之前已以抄本的形式流傳經久，但從宋代以來藉由官方或商業市場的力量，而有更大規模、更有系統的集纂刻印。這些書籍的流通或也改變學習知識的方式。經由「秘笈」而得到某種能力的想像在寫本時代已經存在，然而現在這些文本知識可以不透過個人關係密傳，而可在

³⁵ 全建平，《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頁 42-44。

³⁶ 全建平，〈日藏元泰定重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探微〉，《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2（2018）：83-86；全建平，〈國圖藏元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雲錦》探微〉，《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5.2（2019）：10-17；謝水順、李珽，《福建古代刻書》，頁 189, 192-193。

³⁷ 楊守敬，《日本訪書誌》卷一一，頁 36。

市場上取得。當這些文本累積愈多，且讀者知道有更多未能寓目的文本流傳在外時，一本收集各方重要文本、分類排序的出版品，便成為這些知識愛好者的渴望。因此從宋到元，除了包含一切的類書之外，各知識領域的「大成」、「要略」、「集纂」也漸次出現。

《事林廣記》以其「事無不該，物無不貫」，兼攝「事」、「物」的野心，收錄各領域已經分類整理的知識。這樣的工作，在出版中心、各類文本知識流通付印的建陽更容易完成。在建陽活動的陳元靚可以收集到這麼多的文本知識，博聞錄之。更重要的是，元代的書商即使沒有陳元靚，也可以大量增補類書內容。以較早的至順椿莊書院版《新編圖纂群書類要事林廣記》來說，十二冊中分為前集十三卷、後集十三卷、續集八卷、別集八卷。在四十二卷中把知識分為四十三類。其中很大部分的內容是元代書商的創造，增補陳元靚無從知道的大量元代地理、官制等資訊。強調《事林廣記》的「通俗」，或視《事林廣記》為「日用」類書的起源，常是因為《事林廣記》收入所謂的「日用」知識。然而如果從宋代以來知識分類書籍的發展，《事林廣記》收入這些內容，與其是為了「通俗」或日常實用，更不如是西園精舍本封面所說的是為了「事物萬殊俱類聚，古今一覽盡精微」，而將所能收集到的各領域分類文本知識全部編入。³⁸ 其所展現的更是刻本時代以來文本知識集纂的累積成果。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與元刊本《事林廣記》同時代、甚至由相同書坊在建陽刊印的《居家必用》，不僅與《事林廣記》分享類似的版式，亦分享著類似的出版文化，即分類輯纂既有的文本知識，成為博聞之士願意購買的商品。

二·宋代以來的「家庭」與家庭知識

然而《居家必用》與《事林廣記》即使有類似的編輯方針，但最根本的不同是《事林廣記》欲蒐羅所有事物的知識，而《居家必用》僅限於「居家」。如果說像《事文類聚》之類的出版品預設了對辭章典故感興趣的讀者、《事林廣記》預設了對各類文本知識感興趣的博學之士，《居家必用》似乎開啟了一個新的知識領域，以及相應此領域的讀者：家庭。何以書商認為家庭在此時可以形成一種知識領域，並且市場上會有對此領域感到興趣、欲蒐羅所有相關知識的讀者，在此或許必須回到宋元以來家庭組織的發展。

³⁸ 陳元靚，《增新類聚事林廣記》（西園精舍本），書名頁。

不少學者都指出唐宋之際家庭與宗族組織的變化。³⁹ 牧野巽在一九四〇年代便提出宋代以來「近世宗族」的發展，諸如宗法與祭禮在社會中層間的推廣，族產、族譜等維繫宗族之機制的擴散等等，都讓宋代的家族樣貌與唐之前的門閥社會相比，有很大的轉變。⁴⁰ 本文沒有辦法對宋代以來家族組織的歷史做全面性的回顧，唯要指出與家族組織相關的幾類文本，如家訓、家禮、蒙書等，亦在宋代大量出現，這些文本類型的流行與當時家族組織的發展密切相關。

以家訓來說，從司馬光 (1019-1080)《家範》、葉夢得 (1077-1148)《石林家訓》到袁采 (1163 年進士)《世範》、陸九韶 (1128-1205)《居家正本致用篇》，其核心的議題逐漸從家庭成員的道德訓誡轉移到更多具體的家庭管理。以其中流傳甚廣的袁采《世範》來說，全書分為「睦親」、「處己」、「治家」三卷。提示的事項從家庭成員 (父母子女、兄弟子侄、房族親戚) 的關係、家產的繼承與鬮分、防盜防災、奴僕婢妾的管理、人戶田產的交易，乃至賦稅輸納等等，涵蓋家庭治理的各方面。相較以往的道德訓誡，袁采的《世範》有更多實用層面的內容，而這些內容即是當時宗族組織運作可能遭遇的問題。⁴¹

袁采為樂清縣令，並沒有如司馬光等的名聲。根據他淳熙六年 (1179) 序的開頭：「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為語錄傳示學者，蓋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共之。然皆議論精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況中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物賢於己，非有裨於名教。亦有為家訓，戒示子孫，或不該詳，傳焉未廣。」⁴² 也就是說，他所出版的《世範》是要議論淺近、有裨教化，並且不若一般僅留給子孫的家訓，要該詳而傳廣。一方面顯現出袁采推廣其治家心得的意圖，一方面也表示有許多的家庭管理者需要這些文本知識作為參考。袁采做此書的意旨是有意面向更廣大的讀者，傳授治理家庭的方針。

³⁹ 相關著作眾多，參考 Patricia Ebrey, "Early Stages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ed.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Lee Wat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p. 16-61; 井上徹、遠藤隆俊編，《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5）。

⁴⁰ 牧野巽，〈近世中国の宗族〉，氏著，《中国家族研究》（收入《牧野巽著作集》，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80，第2卷），頁121-164。

⁴¹ 關於袁采《世範》的解析，見 Patricia Buckley Ebrey, *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ü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讀む》（東京：汲古書院，2015）。

⁴² 袁采，《世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四篇，臺北：新興出版社，1974），卷下，頁9a（總頁2381）。

在家訓之外，家禮與蒙書也有類似的發展。前者欲將正統的家庭儀節推廣到社會的中間層，以如祭祖等制度化的儀節結合家族成員、維繫家族組織的運作。後者則是啟迪家庭的下一代。在門閥社會消解之際，讓下一代具備相當的文化資本，以維持或提升家族社會地位，是一家之長的重要工作。而無論家訓、家禮或蒙書，在宋朝的發展都是愈來愈淺近、愈來愈趨實用，其預設的讀者群亦愈來愈擴大。⁴³ 雖然對這些文本在宋朝時具體流通情形的研究還不足，然而眾多不同文本的出現以及表現方式的淺明實用，說明在社會結構變動之際，有許多讀者需要運用這些文本知識來塑造與他們切身相關的組織，無論是吸取管理家族成員與家族產業的經驗、締造確認宗族紐帶並具有正統性的祭祖儀式，或是學習培養下一代的方法。

這些圍繞著家庭領域的知識文本在宋代各自流通，如《家禮》有各種更容易利用的版本。一直到十四世紀上半葉的建陽，書坊更熱衷於出版分類文本知識的參考書，用盡心思重新組合各種新書來吸引讀者時，本身就聚集各種文本，且在意欲包羅萬象的《事林廣記》屢次組合重印之際，從流通的文本中組合出以居家領域為主體的《居家必用》，對書坊來說是非常合理的商業嘗試。

貳·家庭知識的結構：元刊本《居家必用》

元刊本的《居家必用》與同時期的《事林廣記》有許多相似的地方。兩者版型大抵相同，如版心到小題前的花魚尾，版框大小也相近：西園精舍本《事林廣記》約為 17cm×11cm，而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居家必用》約為 17.5cm×11cm（圖一、圖二）。比一般書籍略小的開本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這樣的大小正好可以拿在手上閱覽。而對小題的強調、插圖圖表的運用等，則讓兩書雖然版面小，但條理清楚，一目了然。

然而相較於在十四世紀上半前已有前集、後集、續集、別集，多達五十卷的《事林廣記》，《居家必用》始終維持在十集。在搜羅齊全的目標之下，許多類書不免卷帙浩繁，不僅成本較高，也應用不便，特別在各種補編、續編出版之後。元代建陽書商因應這種狀況，已有對同樣主題之類書出版簡本的操作。如同樣是給寫作應酬、社交文字作參考的類書，大德十一年（1307）刊行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

⁴³ 參考張文昌，《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多達十五集，208 卷。泰定元年（1324）由詹友諒改編前書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改為十集，134 卷。然而同年（1324）由劉氏日新堂重刻出版的《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只有五集，55 卷。比起《翰墨全書》，《啟筭青錢》收錄前人詩文較少，分類典故也較為簡要，而以更實用性的往復簡筭、各種場合所用之文字範本為主；並且大量運用分欄、表列，更方便讀者查找，與明清流行的《酬世錦囊》、《尺牘大全》等書更為相近。⁴⁴

相較於卷帙浩繁、包羅萬象的《事林廣記》，沒有編者之名的《居家必用》確實有可能是建陽書商為了新讀者開發出來的產品。將內容眾多的《事林廣記》取其與居家相關的部分，讓好博之士樂閱的讀物，成為個人居家必備之書。的確兩者收錄的內容頗多重疊之處，《居家必用》採用的數幅插圖也與《事林廣記》雷同。然而細觀《事林廣記》與《居家必用》的體例，兩者又有不同之處。首先，相較於門類井然的《事林廣記》，《居家必用》以十干分為十集，各集之下即抄錄文本，不再分類。雖然各集中的文本隱有相關的主題，但「分門別類」以展現知識的系統並非《居家必用》的重點所在。其次，《事林廣記》意在廣博，因此在各部門底下傾向摘抄許多不同來源的文本；而如其書名，《居家必用》則傾向收集該主題的「必用」文本，並加以節縮。有時《居家必用》收入了原來文本的序，但常將原書各卷打散，對內文有所刪節。在內容上包含一切的「事林」與有限度的「居家」相對，而在編纂方式上亦可以看到「廣記」與「必用」在揀擇上的差別。

就這兩點來說，《居家必用》提供的是相較來說簡要的家庭參考書，包含各個主題，而在各主題中挑選編者認為的「必用」文本。讀者只要擁有這本書，就可以掌握四散各處各種居家知識相關文本，不需要一部一部收集購買，降低了讀者擁有這些知識的門檻。這些個別與居家相關的文獻，也因為收入這樣的「文選」，可以流傳更廣。儘管常常不是完整的版本，但是因此可以保留下來。

然而這第一本家庭百科如何架構收入的居家知識呢？雖然現在元刊《居家必用》沒有完本，但透過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甲乙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的王癸集，以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最前面的「居家必用總目」，配上明刊本所收錄的同名內容，仍可以一窺第一本以居家為範圍的百科全書界定的居家知識範圍。以下分析元

⁴⁴ 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19-12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不著撰人，《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21）；也參考全建平，〈日藏元泰定重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青錢》探微〉，頁 83-86, 91。

刊《居家必用》的知識結構，然受限只有看到甲、乙、壬、癸四集原本，對此四集著墨較多。

元刊《居家必用》分為十集，每集分若干大標題。各大標題或者是一篇文章，或者底下又分若干小項。以下以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居家必用總目」列出來的標題為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壬癸兩集與總目不同處以方括弧標出：

- 甲集 童蒙須知、文公訓子帖、初讀書法、永字八法、姜白石書譜、切韻捷法、翰墨新式、家書通式
- 乙集 薦饗儀範、袁氏世範、省心雜言、勸善錄、太上感應篇、養生秘訣
- 丙集 拜命曆、衛生方
- 丁集 寶貨辨疑出納生放附、文房備用、滴漏捷法、造諸墨法、造古經牋法、諸品香譜、造燭炭法、烏髭鬢法、閨閣事宜、洗染衣帛法
- 戊集 諸品茶湯、諸品漿水、法制香藥、糖蜜煎法、收藏菓子、造酒醋醬豉、造菜蔬法、醞造淹藏日
- 己集 養老奉親書、救荒辟穀、李氏食經
- 庚集 吏學指南、為政九要
- 辛集 定本策、四事十害
- 壬集 營造宅經、興工造作日、入宅移居日、冠婚[昏]儀禮、喪服圖式、五服圖、作神主式、⁴⁵ [喪葬祛惑]、族葬圖說
- 癸集 山居要錄、種花菓法、耕育種植法、[耕育種植日附置產契券日]、牧養良法、[養魚法]、牧養擇日法、百怪斷經

甲集

甲集收錄的內容以訓蒙、作文為主，顯示出對文化能力的重視。〈童蒙須知〉、〈文公訓子帖〉皆傳為朱熹所作。〈童蒙須知〉分衣服冠履、言語步趨、灑掃涓潔、讀書寫文字、雜細要宜等，逐目條列童蒙行為規範。〈文公訓子帖〉則為朱熹送長子朱塾（1153-1191）到婺州從學呂祖謙（1137-1181）時的家書，內容是對兒子的訓勉。〈童蒙須知〉被視為是朱熹所作，明代以後廣泛流傳，被收入如陳宏謀（1696-1771）《五種遺規》等蒙書集成中。⁴⁶ 然而〈童蒙須知〉未見元代《居家必用》之

⁴⁵ 臺北故宮博物館藏本標題作「神主式」。

⁴⁶ 趙振，《中國歷代家訓文獻敘錄》（濟南：齊魯書社，2014），頁 79-83。

前的刻本，同時期《事林廣記》「幼學類」中未收，在元之前也沒有相關記載，書目中也沒見到。也就是說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的《居家必用》可能是〈童蒙須知〉最早的刻本。近年學者在黑水城文書中辨識出疑為〈童蒙須知〉的抄本殘片，雖然不知確切日期、此殘片也沒有列朱熹的名字，但可知〈童蒙須知〉在民間確有以抄本流傳。⁴⁷ 確實有許多文獻是經過被《居家必用》等類書收錄，而以刻本形式保留下來。雖然〈童蒙須知〉在明代之後流通廣泛，幾乎被定論為朱熹所作，但其作者可能偽托、內文可能刪改，不能遽下定論。

然而無論前兩篇是否真為朱熹所作，以朱熹訓蒙作為全書開篇，可見得《居家必用》繼承了宋代以來注重子嗣培養的發展，以及宋代理學的影響。接下去的〈初讀書法〉先錄了「入學說」、「小兒讀書法」、「小兒寫字法」等條，而後摘錄幾條程頤與朱熹論讀書的句子。「入學說」、「小兒讀書法」、「小兒寫字法」這三條在不同元刊本的《事林廣記》亦有收入，並且內容更完整，加入元刊《居家必用》未載的「看史書法」、「讀書作文法」、「改小兒文字法」等內容。⁴⁸ 而在明刊本的《居家必用》這些內容被標為〈王虛中訓蒙法〉，繫為南宋王日休 (?-1173) 所作，且因為明刊本《居家必用》的流行，而成為定名。⁴⁹

「入學說」等條目是文字淺近、容易執行的兒童讀書指南；⁵⁰ 而後從《朱子語錄》等摘抄的字句是更進一步的讀書方向。在此之後收錄的「永字八法」、「姜白石書譜」、「切韻捷法」則分別是宋元時期流行的寫字、協韻入門。從這裡可以看出《居家必用》甲集開頭的結構先是兒童身體的規範，接著是讀書、寫字與作文，可說收集了當時教養子弟的相關文獻，形成簡便的教程。

甲集的後半〈翰墨新式〉與〈家書通式〉提供各種日常應酬文字的寫作範本與慣用語句。從追溯到唐代之前書儀開始，在南宋晚期已經出現供人參考撰寫應酬文

⁴⁷ 張新朋，〈《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之儒學典籍殘片考〉，《敦煌吐魯番研究》17(2017)：49-57。

⁴⁸ 如陳元靚，《增新類聚事林廣記》（西園精舍本）後卷九，頁6-8。

⁴⁹ 亦參考陳柳晶，〈從元刊本《事林廣記》看元代幼學的發展：兼談《王虛中訓蒙法》之源流〉，《寧夏社會科學》204(2017)：175-179。該文作者稱元版《事林廣記》給這些條目〈王虛中速成法〉的標題，但至少西園精舍本與椿莊書院本都沒有標題。該文作者認為這些條目來自王日休的《速成楷模書》，到明之後以〈王虛中訓蒙法〉知名。

⁵⁰ 如「小兒寫字法」一條說：「寫字不得惜紙，須令大寫，長後寫得大字。若寫小字，則拘定手腕，長後稍大字則寫不得。予親有此病也。寫字時，先寫上、大、二、三、日，不得過兩字。兩字端正，方可換字。若貪字多，必筆畫老草，寫得不好。寫得好時，便放歸，午後亦可上學。」

字的商業出版品。⁵¹ 而如前所述，元代建陽書坊不但出版了大部頭的《翰墨全書》，後來也有更方便查找的《啟筭青錢》等參考書。而《居家必用》收錄的是更簡單易用的刪節版本，這類的刪節版可以看出對一般讀者來說最重要、一定要知道的文字是哪些。「應酬指南」這類參考書的流行，表示有愈來愈多的讀者需要在社交來往中使用這類文字，而這類文字的重點即是在不同人際互動的場合之中，以具有文化意涵的格套用語來界定彼此之間的關係。

以〈翰墨新式〉中的「小簡往式」為例。「小簡往式」把送與人的書簡分成二十一個段落：具禮、稱呼、座前、間闊近別、瞻戀、即日、時令、伏惟、起居、祐助、尊候多福、人事、更不縷述、伏冀恕察、託庇、知感、不煩記錄、謹奉啟、未由瞻近、祝頌、不宣。其中「人事」是書簡中真正要表達的事項，而其他各段落則提供針對不同對象的套語。讀者在各段落中選擇適用的套語，即可組成全文。如最開頭的「具禮」，分為平交、稍降、尊長、父母、僧家、道士與居喪，寄信人根據與收信人的關係，在每項下選擇適合的套語使用。而之後的「饋送請召式」，則是針對「送禮」、「請客」這兩項活動引申出來的各種應對場合，提供對尊長、平交與通用的應對文字。光是送禮，就有饋送、承見惠（接受）、以物回答、承惠不敢受（表示感謝但不收）等等各種場合，依據對象有不同套語可以選擇。送禮是人際關係締結、增厚的重要活動，而這些文字便是讓這些活動中透過物與文的同時交換，重新確認彼此的相對關係。無論是送禮或會見，這些格套化的文字讓人際關係導向可以預期的軌道。透過這些樣式，稍懂文字的讀者可以將各要件填入，寫出合乎禮節的應酬文字。如《酬世錦囊》等應酬參考書在明清以降相當流行，《居家必用》的這個部分是日後此類參考書更進入家庭領域的先聲。

乙集

乙集收錄內容包括祭祀、理家、勸善與養生。〈薦饗儀範〉由孫偉作於紹興三年（1133），元刊本收錄的是一年四時與祖先忌日的祭禮儀規。根據文中反對燒紙錢，言「[孫]偉今一切斥去之。有違此訓，非孫氏子孫也」，可推測此文對象原本是家內成員。而在序中作者強調：「經曰：『祭從生者』，蓋視子孫之為大夫、為士、為庶人也。傳曰：『祭從先祖』，又重於子孫改作也。禮固不敢輕議，酌古參

⁵¹ 周一良，〈書儀源流考〉，《歷史研究》5（1990）：95-103；盧冰，〈魏晉至清代的書儀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論文，2017），頁45-62。

今，唯其宜，唯其稱，或庶幾焉。故取上士祭饗之時，傳古士、庶人之禮，著孫氏薦饗儀範。實取有田則祭，無田則薦之義。雖貧窶衣食不充，亦可求仁者之粟力行之。」可知此文主要在「酌古參今」，制定讓士人、庶人都可實行的祭祀方式。如在「版位」一節，就表示「古者士大夫皆有家廟，既虞則作主，刻官封名氏。今以祭寢之禮，參酌以栗木作牌子」，引介神主牌的作法。這些儀規顯示出宋代向士庶推行家禮的趨勢，因而此文被收入這本給家庭的參考書。

在〈薦饗儀範〉後收錄的是〈袁氏世範〉，即前述袁采的《世範》。〈袁氏世範〉收錄治家處世的原則，從析分家產到處置奴婢，亦是從宋元以來相當流行的家訓範本。《居家必用》雖然收入了本書的序，也保持了原書「睦親」、「處己」、「治家」的段落，但取消了全書的分卷，並在選擇的條目上有所取捨，收錄的是經過揀擇的選本。⁵²《世範》傳本「睦親」、「處己」、「治家」三個部分篇幅相差不多，然而《居家必用》顯然在「治家」中選擇條目較多。在全部 52 條中，有 30 條選自「治家」。⁵³《世範》本身原本就不僅只在理家，然而《居家必用》對其中道德勸誡與說理的部分選擇較少，而更偏向實質的理家內容。

如果說乙集上半段有「齊家」的主題，則乙集下半段的〈省心雜言〉、〈勸善錄〉、〈太上感應篇〉與〈養生秘訣〉重點在個人的修練。〈省心雜言〉收錄「可以警悟人心，可以扶樹世教」的格言警句。開頭有托言吳澄 (1249-1333) 的話，說此集最早為林逋 (968-1028) 所輯，吳恬庵繼之。⁵⁴〈勸善錄〉是近四十個勸善的小故事，其小序述其目的：「錄者緝三教聖賢至言，引古今善惡因果，流布天下，省悟人心。願持是編，更相開導，救其將來，勉而行之。」⁵⁵而〈太上感應篇〉是自宋代起便十分流行的勸善文。《居家必用》收錄之後，並加入一條「靈驗記」，敘述兩則分別在紹興二十一年 (1151)、三十一年 (1161)，發生在四川的靈驗故事，

⁵²《居家必用》收錄的是淳熙十年 (1183) 劉鎮為袁采所寫的序，而不是淳熙六年 (1179) 的袁采自序。

⁵³ 大澤正昭統計，卷上「睦親」65 條收了 13 條，卷中「處己」68 條收了 9 條，卷下「治家」73 條收了 30 條。見大澤正昭，《南宋地方官の主張》，頁 166-168, 191-192。

⁵⁴ 吳澄是集中知名人物中出生最晚的，葉德輝認為可以此推測大概的出版年分。見葉德輝，《郇園讀書志》卷六，頁 23a。

⁵⁵ 此錄後世常署名「淮海秦氏」，書目常謂是秦觀 (1049-1100) 所輯。而此序署名「與號竹西處士秦昇謹識」，如此看來，秦觀應該是後來托言的說法，在元刊本是秦昇。酒井忠夫便因為沒看到元刊本，而以為此錄為秦觀所輯。見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頁 213。

李仁淵

均因看此篇而得救。這三個部分都帶有三教合一、果報勸善的性質。本集最末的〈養生秘訣〉，則分別引從《雲笈七籤》、《修養大略》等處摘錄的養生秘訣十二條，則又是以道教的理論來修身養生。

丙集到辛集

丙集開頭收錄了〈拜命曆〉。根據明刊本《居家必用》，〈拜命曆〉又稱〈趙氏拜命曆〉，紹熙四年（1193）序中稱是由趙師俠以家中舊藏書加以增益，再付刻版廣傳。序中稱是書「凡彈冠願仕，皆所欲知」，為針對官宦上任擇日的避忌書，在宋代曾經流行一時。⁵⁶ 丙集後半的〈衛生方〉為醫方，但因原本不存，而不知內容為何。

丁集與戊集從標題來看都是各種與「物」相關的知識，包括文具、香燭、衣帛、茶湯、醬醃等等。而到己集的〈養老奉親書〉、〈救荒辟穀〉、〈李氏食經〉，則又回到藥食養生。其中〈養老奉親書〉為十一世紀末陳直所著，所載養生奉老之道，自宋代以來便十分流行。

庚集、辛集則收錄與官吏相關的文本。〈吏學指南〉根據大德五年（1301）的序，為吳郡許元瑞所作，原名〈習吏幼學指南〉。此書因為保存許多元代吏學的知識，而較早被學者所注意。⁵⁷ 而〈為政九要〉與〈四事十害〉等都是官箴，其中〈四事十害〉即為真德秀（1178-1235）所著之〈西山政訓〉。

壬集到癸集

壬集分為兩個部分，前半段的「營造宅經」、「興宮造作日」、「入宅移居日」都與屋宅的興建入居相關，亦包括做灶、修路、開倉等各種土木工作的忌日吉時。而後半段的「冠婚儀式」、「喪服圖式」、「五服圖」、「作神主式」、「族葬圖說」等則是家庭冠、婚、喪禮的具體作法，多從朱熹《家禮》等書摘錄，而與《事林廣記》〈家禮類〉中的記載頗多雷同。如婚禮便將納采、納幣、親迎、廟見、雙方告廟文、雙方草帖格式、婚書格式、聘定禮物狀式、唱拜致語、佳期綺席詩、撒

⁵⁶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17，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重印），丙集，頁14a；謝輝，〈《彈冠必用集》與宋代的兀日忌諱〉，《棗莊學院學報》34（2017）：1-9。

⁵⁷ 見佐伯富，〈吏學指南索引〉。

帳、合婚吉凶、問婚娶嫁等吉日、入門避忌等各個環節都清楚說明。特別的是《居家必用》還載有「嫁娶新例」，收錄了大德八年（1304）規範各戶等的聘金、筵席等級，以及同姓不得為婚等條例。另外還規定「諸色人等」同類結婚各依其俗、不同類以男性為主，而蒙古人不在此限。即將當時最新的國家婚禮規定也收錄進去。

而葬禮除了服制、服圖、神主等以圖像說清楚規制以外，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王集尚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總目中沒有出現的〈喪葬祛惑〉，收入司馬光的「溫公葬說」與程頤（1033-1107）的「程子葬說」，強調祖先墓葬之禮的重要性。本集最後附上趙季明的〈族葬圖〉與〈族葬圖說〉，以文字與圖像說明「族葬」如何執行。在合族祔葬一地的原則底下，趙季明認為雖然祠堂祭祀依照朱熹《家禮》及於四世，然而族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後以小字解釋：「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自孫始造塋而葬者也。」以始祖的墳塋為中心，其後子孫需依昭穆齒列、不分嫡庶，依次下葬，並以圖說明子孫墳墓的排列原則。⁵⁸ 趙季明的說法肯定「始遷祖」，以及始遷祖之祖墳的重要性，對南宋、元代因各種原因遷徙的家庭來說，給了承認當地立祖墳，以墓祭建立宗族聯繫的正當化理由。而宗族成員透過祖墳與後續列祖的墓葬安排得以結合成一體，並且突破四世的禮制限制，得以一直延續下去。這樣的概念，即使未必都可實行，但成為明清以降對宗族墓葬的理想。儘管趙季明此人誰已經無從得知，但他的〈族葬圖說〉或許因為切合需要，而在元代的類書中繼續流傳下去。

癸集收錄的則是通常會被歸為農書的內容。首先是傳為唐代道士王旻所作的〈山居要錄〉，收錄各種菜蔬種植的方法。⁵⁹ 接著是各種耕種牧養之法，包括種植各種花果樹木的方法、牧養挑選各種牲畜家禽的方法，以及與種植、興建畜舍等相關的吉日凶日。其中也包括置買田產、立契交易的吉日凶日，而在臺北故宮藏本特別被標誌出來，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的總目有所差異。

本集最後是〈百怪斷經〉。〈百怪斷經〉為各種占術，可追溯到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抄本，包括鴉占、噴嚏占等等。⁶⁰ 然而臺北故宮藏本癸集〈百怪斷經〉的部分

⁵⁸ 關於元人族葬與趙季明〈族葬圖〉參考何淑宜，《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55-69。

⁵⁹ 見大澤正昭，〈『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所引唐・王旻撰『山居錄』について〉，《上智史學》55（2010）：111-140。

⁶⁰ 岩本篤志著，何為民譯，〈敦煌占怪書〈百怪圖〉考以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本和法國國立圖書館藏的關係為中心〉，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126-142。

沒有留下來，但根據癸集前面的目錄，此本〈百怪斷經〉與敦煌殘本、明刊本《居家必用》、以及後世流傳的〈百怪斷經〉都非常不一樣。其條目如「羊生三犢」、「猴生狨」、「六畜夜鳴」、「四足學人言」、「死樹生枝」等等，比較像是各種與動物、植物相關的異像，可能也是因此才會與農牧知識放在同一集。然而因為內容沒有留下來，難以評斷這種差別的原因。

從整體來看，元刊《居家必用》分類並不齊整，有時候看似關係不大的內容被放在同一集（如〈拜命曆〉與〈衛生方〉），而如家庭禮儀卻又分別被放在乙集與壬集。這樣的結果或許是因此本為書商草就編集。就知識類型說，可說包括童蒙習字、啟筭文範、家禮家訓、修身勸善、擇日剋擇、醫藥養生、飲食農牧、財貨物品與吏學官箴等各方面，由此可見其「居家」知識的範圍。

所收錄的內容展現宋代以來對許多文本知識收集整理的結果，如〈養老奉親書〉的養生知識，或是書筭、農牧、卜占等相關的知識。然而在收集的時候，編者又作了一些調整，而更趨向簡明實用，如對《世範》等書的擷取，或對各種應酬文本的簡化。編者傾向挑選名家背書的文本，如朱熹、程頤；有些文本收入序，也是在表明此文獻的權威性。

從收入仕宦吏學相關的知識來看，《居家必用》預設的讀者或許是仕宦之家或步上仕宦之路的家庭中的家長。⁶¹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在甲集、乙集目錄之前都有半頁的插圖。乙集的插圖是兩人持笏著官服朝向平台上的數列古代樂器、器皿、菜餚之前。甲集則是老中青三人著儒服，呈三角構圖側站朝前作揖。中間蓄鬚中年臉朝向白面青年，讓畫面的氣氛流動了起來。這兩張圖或許都與兩集內容有關，如甲集的為學與乙集的禮儀，但應該不是為了此書而刻，為書商從他處借來。而甲集前在全書總目後的三儒者，或者也就暗示了此書預設的讀者：對仕宦相關的知識有興趣、需要管理家庭、有餘裕修身養生，並且會想要積極地培養下一代。在宋代以來理學的影響、家禮書儀漸漸朝中下層士大夫推行之際，這群人對這些文本知識感

⁶¹ 亦見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頁 18-19；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400-401。不同於宮紀子認為《居家必用》是元代恢復科舉後、在科舉文化下影響的產物，Benjamin Elman 認為《居家必用》是元代科舉不盛下，針對地方吏員與平民，提供他們在家中使用的實用知識。Elman 似乎誤將《居家必用》收入之〈吏學指南〉大德五年（1301）的序認為是全書的序，而以為此書在元代恢復科舉前出版，主要閱讀對象是在家鄉服務的書吏，因此有這樣的論斷。見 Benjamin 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Special Issue (2007): 134.

興趣，會想應用這些知識來改進自己與自己的家庭，並且有能力且有意願購買這樣全覽式的書籍。

參·明代《居家必用》的重刊與重組

一·《居家必用》在明代的流傳

雖然收入的主要是宋元時期的文本，到了明代《居家必用》仍持續刊刻，而且流布的範圍更廣。其中一項重要的因素是明代宮廷的內府刻印了《居家必用》，這個內府刻印的版本成為後世《居家必用》的定本。不僅現今流傳的明代版本幾乎全是內府本，或重刻、改編自內府刻本，前述元刊本幾乎沒有留存，被明代內府刊本取代。

現存內府刻本有一段常被忽略的記載。明刊《居家必用》乙集在〈家禮〉這個主題底下先是收入了基於朱子《家禮》的四種禮儀略說，後載孫氏〈薦饗儀範〉。兩段中間有一段按語：

季氏《居家必用》初卷略載文公《家禮》，其意甚善。又按秦氏本不載，別載孫氏〈薦饗儀範〉。今觀文公《家禮》，非可妄損益。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詳見本書全帙。於祭禮一條，孫氏家儀亦可參擇用之，故并存於后。⁶²

這條按語透露《居家必用》曾經有「季氏本」與「秦氏本」。季氏本把朱子《家禮》放在首卷，不若現存明刊本是放在次卷。而秦氏本不載朱子《家禮》，只收〈薦饗儀範〉。也就是說，在內府本獨大之前，《居家必用》尚有不同本子，其組織、內容不一樣。然而在內府本成為定本之後，季氏本與秦氏本都不為人知，甚至許多藏書家都不知道有元刊本。

現存的明刊本有注為司禮監刻本者（圖三）。司禮監為明代內府掌管書籍、書版的單位，劉若愚（1584-?）《酌中志》的〈內板經書紀略〉中列了當時崇禎年間司禮監存有的書板，其中有「《居家必用》十本，八百八十葉」。⁶³為何內府要刻印一本元代建陽書商出版的居家參考書，現有的資料沒有直接的解釋。明代宮廷刻書有不同單位，也有不同目的。⁶⁴除了御製詩文與朝廷典制之外，內府刻書可能是因

⁶²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乙集，頁61。

⁶³ 劉若愚，《酌中志》（清海山仙館叢書本），卷一八，頁4b。

⁶⁴ 馬學良，〈明代內府刻書機構探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3（2014）：42-46。

為宮廷內部實際需求，如〈內板經書紀略〉中除了《居家必用》外，亦有《通書大全》、《玉匣記》、《解夢書大全》等實用書籍的版片。故刊刻《居家必用》可能是宮廷中的實際需要。

其次，司禮監刻書也可能是為了做為內書堂用書。內書堂成立於宣德年間(1426-1435)，為培養內官所設，為司禮監掌理，不少內府刻書為內書房所需。⁶⁵《酌中志》描述內官的閱讀情形：

內相學問讀《四書》、《書經》、《詩經》、看《性理》、⁶⁶《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東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篇》部頭以便檢查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查不憚疲苦。……《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皆樂看愛買者也。⁶⁷

劉若愚先是敘述內官的閱讀狀況，後列出司禮監所藏書板，而前段提到的書目都在後面的表列出現。後附書版表列的順序並沒有說明原則，但把《居家必用》列於內官閱讀的《貞觀政要》與《聖學心法》之間，似乎《居家必用》亦可能是內官讀物。

前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經點明《永樂大典》引用《居家必用》，可知明初《居家必用》仍在流通。然而當時流通的版本、內府何時刊刻《居家必用》，以及內府本之外是否有其他版本的《居家必用》流傳，以目前的資料來說很難確定。序於弘治十七年(1504)的《建陽縣誌續集》，其「典籍」一節中列出建陽書坊刊行的書目，其中有《居家必用》十二卷，可以知道在弘治年間已有建陽書坊刊印《居家必用》。⁶⁸ 這個版本有十二卷，與現存元刊本或內府的十集十本都不同。晁瑛(?-1560)在嘉靖年間的《寶文堂書目》中列有：「《居家必用》內府刻十本，閩刻六本，蜀刻一部。」⁶⁹ 可知到了嘉靖年間，除了內府刻本之外，在福建與四川都刊

⁶⁵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六，頁6a。

⁶⁶ 疑為「《性理大全》」。

⁶⁷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八，頁2b-3a。

⁶⁸ 袁鈺修，弘治《建陽縣誌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76，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頁19a。

⁶⁹ 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919)，卷中，無頁碼(總頁48)。

刻《居家必用》，其中福建的六本版亦與現本不同，有可能即是前面《建陽縣誌》列的十二卷、兩卷一本。只是這些版本都沒有流傳下來。

既然嘉靖時期的書目已經載明有內府本，則內府本刊刻至少在嘉靖之前。最早有明確時間的明刊本《居家必用》為序於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洪楩杭州刻本。此本是基於內府本的重刻本，其序為日本京都松栢堂寬文十三年（1673）刻本所保留，又因為松栢堂本影印出版而為學者所知。⁷⁰ 此序由《西湖遊覽志》、《炎徼紀聞》等書的作者錢塘田汝成（1526年進士）所作。序中說《居家必用》「國朝內府已有刻板，然簡素重大，不便奚囊。方泉洪君子美勒而小之，鑿校精嚴，踰于前刻」。⁷¹ 這裡的「方泉洪君子美」即洪楩。洪楩，字子美，繼承了父祖的產業而在嘉靖時期杭州的文化界相當活躍。其家藏書豐富，重刻了許多宋元書籍，如以「清平山堂」為名刊刻了六集共六十篇宋元話本，另外又重刻《唐詩紀事》、《新編分類夷堅志》、《六臣注文選》、《路史》等宋本書，以精而多著稱。⁷² 《居家必用》相較他刊刻的其他書籍似乎有些不同，推測吸引洪楩的理由之一可能是《居家必用》中的文本均來自宋元，正合洪楩口味。

更重要的是，序中說明之所以要重刻內府本，原因之一是內府本開本較大。洪楩「勒而小之」，讓此書更便於攜帶。開本的選擇表現出刊刻目的不同。內府書籍並不打算在外界流傳，雖然如〈內板經書紀略〉所說，有些書被夾帶出來販售，這些被夾帶出來的書或許就成為重刻的底本。⁷³ 由於不打算商業流通，因此不用考慮開本大小。臺北故宮博物院現存明司禮監刊本，其版框為 21.3cm×15.8cm，比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的 17cm×11cm 的確較大。原本元刊本為書坊所刊，開本較小，也不求字體精緻。而在內府重刻時，不但開本較大，字體、版面也較精緻（圖一、圖三）。到了洪楩重刻，雖未必意在販售營利，但希望廣其流傳，因此又將開本縮小，使之便於攜帶。

⁷⁰ 一九六九年此本《居家必用》收入《家政學文獻集成續編 江戶期 VII》。橋川時雄在解題中說「元刊大字本」保留在明代宮廷，而洪楩縮小刻印。橋川時雄不知明代內府曾刊刻《居家必用》，此說有誤。另外解題提到內閣文庫中藏有一種十五冊本，內容與松栢堂本全同，只是改裝成十五冊。轉引自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書考》，頁 123。

⁷¹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寬文十三年松栢堂本），〈序〉，頁 2。重印標題《居家必用事類附史學指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頁 1。

⁷² 關於洪楩及其家族藏書，見丁申，《武林藏書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66，上海：上海書店，1994），卷中，頁 17-18。

⁷³ 劉若愚，《酌中志》卷一八，頁 1a。

八年之後此書再次重刻。根據隆慶二年 (1568) 的序，署名飛來山人的刻書者說明重刻的理由是「往年梓於吾杭洪氏，今則廢置矣，予深惜之。于是捐貲收集，重加校正，補刻遺闕，使永其傳以公于同志云」。⁷⁴ 此「往年梓於吾杭洪氏」，應即指洪楩重刻內府本。然為何才過了八年就已經「廢置」，從序言中難以得知。序中稱「吾杭洪氏」，則此飛來山人應該是杭州人。飛來山人在隆慶五年 (1571) 還刻了《古今名賢說海》二十二卷與《名賢彙語》二十卷，但這兩部書在《四庫全書總目》中都得到不好的評價。《四庫全書總目》稱《古今名賢說海》：「所錄皆明人說部……凡二十二種。種各一卷，皆刪節之本，非其完書。考明陸楫有《古今說海》一百四十二卷，此似得其殘闕之板，偽刻序日以售欺者也。」而《名賢彙語》則是：「亦稱飛來山人序，詞鄙陋，疑為坊賈之筆。其書節錄明人小說二十種，種為一卷，皆題曰某地某人言，尤為杜撰。殆又從《古今名賢說海》而變幻之耳。」⁷⁵ 如果真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說飛來山人為一書商，取得版片後拼湊書籍以圖利，則此版《居家必用》或許也是洪楩重刻後，飛來山人跟風求利的結果。

前兩次在杭州的重刻，僅是改變開本大小，而未改變內容。序於萬曆七年 (1579) 的福建八卷重刻本，則稍微修改了內容。此本封面標題作《新刻校正官板居家必用》，特別強調了「官板」，可見得是重刻自內府本。此本為福建黃氏寶善堂所刻，根據署名水南居士黃希賢所作的序，首先稱讚此書「事兼四民，錄及九流，博大纖悉，罔不具備。大都摘群書之關要，誠居家者必不可少也」。因此「未嘗離左右，即有所外遊，亦不嘗不置之行篋」。然而此書「第編次未得，而事類重複，觀者亦猶病之」，編者決定「更其編次，而重複者亦刪去之，以從簡易。猶有格言至論有切於修身正義之要者，間亦以數語附焉」。⁷⁶ 從此序言中，可知其所有的《居家必用》是可行旅隨身攜帶的本子，故開本、篇幅不會太大。而編者將內府本的十卷本改為八卷，讓其篇幅更小，並且加添一些修身格言等內容。⁷⁷

⁷⁴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184，據隆慶二年飛來山人刻本重印），〈序〉，頁1（總頁309）。

⁷⁵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一三一，頁26b-27b。

⁷⁶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頁211-212；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132-136。

⁷⁷ 酒井忠夫，《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頁212；酒井忠夫，〈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頁134。原書藏日本內閣文庫，尚未見到。天野元之助稱黃希賢編《重刊校正居家必用事類》與福建寶善堂刊的《新刻增補官版居家必用便覽》不是同一個本子，同為八卷。而後者八卷中前七卷選自同行的十卷本，而第八卷從其他書籍中增補。見天野元之助，《中國古農書考》，頁123。不過內閣文庫目錄中兩者為同一本。

自晚明之後，《居家必用》重刻者幾乎都源自內府本，尤其是嘉靖杭州洪樞刻本影響最大。如一九八四年在江蘇太倉南轉村的明墓中發現《居家必用》。墓主夫婦分別逝於崇禎四年（1631）與天啟七年（1627）。據考此墓葬形制規格較低、隨葬器物規格較簡單，除地券版、銅鏡、木梳等器物外，還有四部書籍（共42冊）與手抄文牘十四頁。四部書籍是《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古今考》、《尺牘清裁》與《口字文匯體》。此外《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中夾訂有《戰國策索隱》十三頁，而散夾在《古今考》的十四頁則是與衛所武官履歷相關的簿冊。這是罕見的《居家必用》在讀者手中的狀態。此明墓出土本有嘉靖田汝成序，應該也是源自於杭州洪樞的內府重刻本。全書分為十集，且每頁9行、每行16字，也與常見的內府重刻本相同。然而此版框為14.6cm×10.7cm，比現存許多版本都小，且裝訂為18本，也與常見版本不同。因有「夾訂」《戰國策索隱》十三頁，或許經過重新裝訂。此本因為考古報告只提供一頁模糊的圖版，且為書中插圖，所以無法進一步判別版本。然而其版框較小，應該是更普及的版本。在《居家必用》之外，另外三本亦是參考性質的書籍。⁷⁸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也收錄了田汝成為嘉靖刻本所寫的序。⁷⁹ 此本在目錄頁結尾刻有「絳巖石渠閣校書儂蔣時機重梓行」。根據考訂蔣時機刻書最早約在天啟年間（1621-1627），其在南京的石渠閣應該經營了四代，直到清初，有自編新書、也有翻印舊書。其出版書籍種類眾多，從科舉用書到通俗小說。⁸⁰ 此本又將書中十集每集拆成兩卷，每卷卷頭各配一字，湊成邵雍〈清夜吟〉：「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因此此版每卷的份量較短。

日本流傳較廣、影響較大且曾重新出版印行的寬文十三年刻本收錄了田汝成為嘉靖三十九年本寫的序，因此嘗有以為寬文十三年和刻本是重刻嘉靖本。然而寬文十三年本也將全書以「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分為二十卷，與晚明的南京石渠閣本相同，而明言重刻自嘉靖本的隆慶二年本卻沒有這樣的處理。查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刊於寬文十三年，有刊記「洛下林前和泉掾白水于松栢堂刊之」，而封面襯頁印有「介慎堂

⁷⁸ 見吳聿明，〈太倉南轉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3（1987）：19-22。

⁷⁹ 此本為殘本，缺一集。

⁸⁰ 荒木達雄，〈石渠閣出版活動與《水滸傳》之補刻〉，《漢學研究》35.3（2017）：213-252。本文收集了許多石渠閣的出版品，唯《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沒有列入。

訂正」、「梅墅石渠閣梓」。根據荒木達雄的考訂，梅墅石渠閣應為蔣時機的後代（如蔣先庚）所用，活躍於順治到康熙年間。由此推測，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藏的寬文十三年松栢堂刊本根據的應該是南京石渠閣在清初的刻本。寬文十三年為康熙十二年（1673）左右，如果松栢堂根據的是梅墅石渠閣在順治到康熙間的刻本，則此南京刻本很快就流傳到日本，且在日本重刻。

從絳巖石渠閣本到梅墅石渠閣本，可以知道南京的石渠閣從晚明到清初持續刻印《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而且版式、內容幾乎沒有改變。另外，現收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乾隆三年（1738）德星堂重刻《居家必用》，其內容亦同內府本。此本與石渠閣本相同，把每集分成兩卷，每卷配字亦同，底本可能亦來自南京的石渠閣本，只是無法判定這更晚的德星堂位於何處。此本收入田汝成序，但即使序中開頭就說「不著纂輯者姓名，疑元時人為之」，本書書名頁仍誤標為「錢唐田汝成撰」，可見此本書商較為輕忽而誤認作者姓名。

另外，晚清藏書家丁丙在其《善本書室藏書志》記：

《居家必用事全集》十卷，明刊本。此書不見諸藏書家著錄。惟東瀛《經籍訪古志》著錄有元槧壬癸二卷，每半版十三行行二十二字，卷中標目併二行大書。又明刊本云：「每集首有目錄無序跋，每卷首題『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次行題某集，每半版九行行十六字，卷中標目白文模出，考版式當嘉靖間刊。」此帙考之悉合。⁸¹

其中提到日本《經籍訪古志》著錄的元刊殘壬癸二卷。《經籍訪古志》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零本二卷」一條，下註小字「元槧本寶素堂藏」。蓋寶素堂為小島尚質書齋名，其藏書多被楊守敬購入，故此本應即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刊本。⁸² 而《經籍訪古志》著錄的明刊本為聿修堂所藏，書志作者推測為嘉靖刊本。丁丙抄錄《經籍訪古志》的描述，認為與自己的藏本相同。若比較《經籍訪古志》所著錄的格式，則推測為嘉靖刊本的日本聿修堂本與丁丙藏本應該就是現在流傳較廣的內府本或內府重刻本，有可能原本是前述嘉靖時期的杭州洪梗刻本。從這些有限的資

⁸¹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927），卷一九，頁18b。

⁸² 此條正文：「現存壬癸二集二卷，每集卷首有目錄，每半板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界長五寸二分，幅三寸九分。卷中標目併二行大書。」顧歆藝前文將之誤為二本。此條下還有：「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十卷。舊板大字本，京師三角氏藏。未見。」此本不知為何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卷四，頁24a（總頁275）；顧歆藝，〈《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及相關問題研究〉，頁180。

料看起來，在嘉靖以前《居家必用》還有其他的版本流傳，然而自從官刻的內府本被坊間重刻之後，便都以內府本為主。

從這些版本的變化可以看到，原先元代的《居家必用》是建陽商業書坊的產品，入明後開始也有明代書坊刊印，且不限於建陽。然而在內府刊刻《居家必用》後，內府本成了主導的版本，不僅有藏書家重刻，也有商業書坊重刻，並在杭州、福建、南京、京都等都有刊刻的紀錄。內府刻書開本較大、板式較簡潔。比較起來民間重刻的版本開本較小，使其攜帶便利，然愈後來的版本，刻印品質似乎愈粗糙、開本愈來愈小。

而《居家必用》被內府刻印的結果，也讓《居家必用》的內容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其他商業發行的類書在每次刊刻常增添大量新內容，以致於與最初的版本幾乎全然不同。然而《居家必用》裡面的內容都是宋元時代的文本，即使明代重刻，也未見加添明代內容。或者是因為以官本為號召，讓重刻內府本時書商不至於對書中內容有太大的改動。目前所知明代之後的版本，只有萬曆寶善堂本更動了本書的後半部，然前半部幾乎保持不變。對許多強調「新刻」、「增補」的實用性書籍來說，保存宋元文獻的《居家必用》隱然成為可被其他書籍引用的經典。

這也讓明代《居家必用》的性質與元代《居家必用》略有不同。元代《居家必用》是建陽書坊的產品，雖然元刊本留下來的很少，而中國國家圖書館本與臺北故宮博物院本就已經有差異，在明代內府本之前更有所謂季氏本與秦氏本。這些差異顯現出元刊本應該是隨時調整以切合需要，又有不同出版者互相競爭。然而明代在內府本之後，《居家必用》卻固定下來，甚至在晚明眾多不同的日用類書出現之際，內容也相較改變較少。這時候的《居家必用》仍維持以數百年前的宋元文獻為主，與日用或有差距，而接近一種較具權威性的居家知識文獻。也因此一些文人筆記、醫書會引用《居家必用》的說法，而絕大部分藏書家的書目不收入晚明《萬寶全書》等日用類書，卻會收入《居家必用》。換言之，《居家必用》是最早的家庭百科，但也因為是最早，讓這種類型在另一個商業出版高峰而大量出現時，《居家必用》反而不那麼「日用」，而成為居家知識的古早權威。

二·元明之間架構與內容的變化

現在流傳的《居家必用》與目前所見的元刊在組織架構上相當不同。由於現在流傳下來的明刊本都本自內府本，所以我們無從判斷現在元刊本與明刊本的區別是在內府刊刻時的改動，或者是從元到明代中葉間書商們漸次修改的累積，而由內

府刊本繼承。然而明刊內府本即使與現存的元刊本有很大的不同，但所收錄的文本年代仍限於宋元之前，甚至與制度相關的〈吏學指南〉都沒有更動而保持元代制度，未加入明代的新材料。內府本內容的重新組織必然發生在元刊本與內府本之間，即元代中葉到明代中葉這段時間。因此從元刊本與明刊本之間的差異，仍可觀察這段時間此書定位的變動。由於目前所見的元刊本只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本，而明刊本都來自內府刻本，因此以下前者簡稱元刊本，後者簡稱明刊本。

明刊本與元刊本一樣，都以十干分為十集，然而各集順序與各集中收錄的內容則有很大的差別。明刊本的架構方式與元刊本已有差異。元刊本各集底下直接是不同文本，沒有大分類。而明刊本各集底下有第一層次的標目（下表以粗體字表示）先行分類，之後有各文本的小標，較長的文本又有各節標題，方便查找。各集內容比起元刊本更有系統，依序大致為讀書作文、家法家禮、仕宦擇日、宅舍牧養、農桑、飲食、吏學、衛生與修身。

甲集	為學 朱文公童蒙須知、訓子帖、顏氏家訓、真西山教子齋規、王虛中訓蒙法、朱文公白鹿洞院教條、程董二先生學則、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 讀書 朱子讀書法、程正思論讀書、歐陽文忠公讀書法 作文 朱子論作文、東坡論作文、山谷論作文、沈隱侯論作文、呂居仁論作文 寫字 神人永字八法、姜白石書譜、董內直書訣 切韻 總論、切韻捷法詩、三十六字母五音清濁旁通圖等 書簡 小簡往式、小簡復式等 活套 稟事、承下諭等 饋送請召式 饋送、承見惠等 家書通式 父母與子書、上祖父祖母書等
乙集	家法 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袁氏世範 家禮 冠禮略、婚禮略、喪禮略、祭禮略、孫氏薦饗儀範、季明趙氏族葬圖
丙集	仕宦 文公小學書嘉言篇、四事箴、十害箴、趙氏拜命曆、選日時捷法、李僕射透天關擇時并方位法、許真君傳龍神行度風暴訣、周公出行吉日、百怪斷經、夢寐因想
丁集	宅舍 周書秘奧營造宅經、興工造作日、入宅移居、牧養良法、養牛類、養羊類、養雞類、養鵝鴨類、養魚類、牧養擇日法
戊集	農桑類 種藝類 種藥類 種菜類 果木類 花草類 竹木類 文房通用 燈火 備用 磨補銅鐵石類 刻漏捷法 寶貨辨疑
己集	諸品茶 諸品湯 湯水 熟水類 漿水類 法製香藥 果食類 酒麴類 造諸醋 法 諸醬類 諸豉類 醞造醃藏日 飲食類 蔬食、肉食 醃藏魚品 造酢品

庚集 **飲食類** 燒肉品、煮肉品、肉下酒、肉灌腸紅絲品、肉下飯品、肉羹食品、
回回食品、女直食品、濕麵食品、乾麵食品、從食品、素食、煎酥乳酪品、
造諸粉品、庖廚雜用 **染作類** **洗練** **香譜** **薰香** **閨閣事宜**

辛集 **史學指南** **為政九要**

壬集 **衛生** 養老奉親書、治諸病經驗方、諸雜方

癸集 **謹身** 三元參贊延壽之書、修養秘論、警心、勸善錄、省心雜言

明刊《居家必用》甲集一樣以朱熹的〈童蒙須知〉和〈文公訓子帖〉開始，組織大致與元刊本類似，但加了「為學」、「讀書」、「作文」、「寫字」等標目，讓整集的結構更清楚。明刊本收錄更多宋元時期的訓蒙方法、讀書法等文字。除了原有的〈童蒙須知〉、〈訓子帖〉，還加添了〈顏氏家訓〉、〈真西山教子齋規〉、〈朱文公白鹿洞院教條〉、〈程董二先生學則〉、〈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等訓蒙讀書法，不少與理學相關。其中〈王虛中訓蒙法〉在元刊本只有三條，然明刊本補足，分叉手、著衣、祇揖、入學、小兒讀書、溫書、記訓釋字、寫字、說書、改文字、作詩等，從身體規訓到讀書作文，提示小兒從六歲開始的教導方法，並給了〈王虛中訓蒙法〉這個名字。「讀書」、「作文」方面，亦分別收錄來自（或托言自）朱熹、蘇東坡、歐陽修、黃庭堅等名人討論讀書作文的字句。

比起元刊本，明刊本更注重讀書法。如明刊本收入由元代儒者程端禮（1271-1345）所作的《讀書分年日程》。此書「一以朱子[讀書法]六條為綱領」，從兒童「八歲未入學之前」、「八歲入學之後」、「自十五志學之年」等各個時間段該讀哪些書、各書閱讀順序、各書閱讀方法與要領循序說明，甚至附有表格讓學生填寫進度。《讀書分年日程》原書序於元代科舉再開後之延祐元年（1314）的隔年，根據程端禮元統三年（1335）作的跋，書成後為各江浙書院、義塾刊行，作者又不斷修改，而後國子監刊刻此書頒示各郡縣。由於方法具體又有官方推行，《讀書分年日程》影響極大，成為元代以來學校鄉塾的教學依歸。其依循朱子的讀書順序與方式，長久以來影響最基層的學生的閱讀模式。⁸³ 現存至元五年（1339）出版的元刊《居家必用》或許不及收入，而明刊本便摘抄其大綱收入其中，名為〈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而此集收入的〈歐陽文忠公讀書法〉，也是說明每日持之以

⁸³ 見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9冊）。宮紀子將此書放在元代科舉再開後的出版文化中討論，見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380-394。

恆的讀固定字數，日積月累便可將儒家經典讀完。惟〈歐陽文忠公讀書法〉收錄的文句在此之前多說出自南宋莆田人鄭耕老，似乎在明刊本《居家必用》始繫為歐陽修。⁸⁴ 而因為《居家必用》的流行，讓後世多認為此讀書法出自歐陽修。

宋代理學家已經有不少關於讀書法的討論。元代朱子學地位的提高顯現在這些啟蒙、讀書方法的流行，讀者期望有簡單可循的指示讓家中子嗣進入理學正軌。比起元刊本，明刊本的《居家必用》更補強這方面，將宋元時期的「讀書程序」整理更齊全，提供讀者教養子弟的範本。

在重視讀書之外，明刊本對家庭禮法的呈現與元刊本也有所不同。如前所述，元刊本將關於家庭禮法的部分分散在乙、壬兩集，而明刊《居家必用》在為學讀書後的乙集即標明是「家法」與「家禮」，足以見得明刊本對禮法的注重。不僅將家庭禮法合為一集，明刊《居家必用》家法家禮中理學的位置也得到抬升。元刊《居家必用》乙集把〈袁氏世範〉、孫氏〈薦饗儀範〉和融合三教的〈勸善錄〉、〈太上感應篇〉等放在一起，而明刊在此章把後者全部排除。在家法方面，除了流行且比較實際的〈袁氏世範〉外，明刊《居家必用》收入同樣講治家，但談更多上下尊卑之禮、第一條就是「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眾子弟及家眾」的〈司馬溫公居家雜儀〉。這裡的〈司馬溫公居家雜儀〉即其後收入司馬光《書儀》卷四中的〈居家雜儀〉，明列家中各成員所應該謹守的禮法規則。宋代家訓的發展是有愈來愈多實際的內容，然而明刊《居家必用》在元刊本擷取〈袁氏世範〉中較具體的治家部分後，又把時間較早、而更多原則性規範的〈居家雜儀〉收進來，且放在〈袁氏世範〉之前，讓司馬光作為本集的開頭。

而在「家禮」，明刊本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開頭的〈冠禮略〉、〈婚禮略〉、〈喪禮略〉、〈祭禮略〉可說是朱熹《家禮》的節縮版，之後再載孫氏〈薦饗儀範〉與趙季明〈族葬圖說〉。在元刊本家禮的部分分散在乙、壬二集，而乙集只有孫氏〈薦饗儀範〉。明刊本將以朱熹《家禮》為基礎的〈冠禮略〉、〈婚禮略〉、〈喪禮略〉、〈祭禮略〉放在前面，而在兩部文本間有一按語：「季氏《居家必用》初卷略載文公《家禮》，其意甚善。又按秦氏本不載，別載孫氏〈薦饗儀範〉。今觀文公《家禮》，非可妄損益，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詳見本書全帙。於祭禮一條，孫氏家儀亦可參擇用之，故并存於后。」⁸⁵ 這條按語在明刊各本中都與前條「墓

⁸⁴ 如呂祖謙，《少儀外傳》（清守山閣叢書本），卷上，頁33。收錄幾乎與〈歐陽文忠公讀書法〉一樣的句子，但後繫名為「鄭氏勤學」。

⁸⁵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乙集，頁61。

祭」中引朱熹對墓祭的評論混成同一段。細讀文意此按語實與墓祭無關，而是在說明此本取朱子《家禮》，並保留孫偉〈薦饗儀範〉中祭禮部分的決定。編者認為「文公《家禮》，非可妄損益」，故取朱子《家禮》，說明在選編時尊崇朱子《家禮》，成書較早的孫偉〈薦饗儀範〉僅存「祭禮」以供參考。再者，這些〈家禮〉的內容，針對的是「近世士大夫家能行之者」，也就是說編者也理解當時即使是士大夫，尚有不能行此家禮者。

元刊本在王集下半亦是婚禮、喪禮相關的儀節，然而比較明刊本的乙集，明刊本顯然更遵「禮」去「俗」。元刊本王集下半雖然也本於朱熹《家禮》，但在婚禮部分有「唱拜致語」、「佳期綺席詩」、「合婚吉凶」、「問婚娶嫁等吉日、入門避忌」等部分。其中「唱拜致語」等是婚禮中祝頌的吉祥詩，「佳期綺席詩」下元刊本即註「此非古禮，今姑徇俗，姑存於此」。⁸⁶「合婚吉凶」等則是以生辰算婚配、娶嫁擇日等。其中有一項是「入門忌踏天狗方」，指新婦入門的方位，若從天狗的背、足、腹上入會早得子，從天狗頭尾入會殺夫、害公姑，終身無子。⁸⁷這些算是「俗」但其實很「實用」的內容，在明刊本皆被刪去。而元刊本中的婚書格式，以及「嫁娶新例」在明刊本也沒有保留。此外在喪禮部分，除了服制之外，也補入大量來自朱熹《家禮》的內容。由此可見明刊本對家禮的態度更嚴格，雖然一方面要切合應用，但一方面若不合「古禮」，則全部被剔除掉。而從元刊本保留著的〈薦饗儀範〉與趙季明〈族葬圖說〉，則多是依循禮法所做的調整，闡明神主牌、開基主等切合實用禮法實踐，因此被保留下來。

明刊本在為學、家庭禮法後的丙集標題為「仕宦」。元刊本關於仕宦吏學的知識可以說有兩集半，即庚集、壬集，與丙集前半「彈冠願仕，皆所欲知」的〈拜命曆〉。明刊本在總體比例上略有減少。明刊《居家必用》辛集保留元刊本王集所收的〈吏學指南〉與〈為政九要〉。而明刊本丙集在「仕宦」這個標目下，內容可以分為兩部分：前半段的官箴與後半段關於擇日、夢占等知識。

前半段的官箴收入元刊本就已經有的真德秀〈西山政訓〉中的四事、十害，但開頭則代以〈文公小學書嘉言篇〉。這裡的〈文公小學書嘉言篇〉乃是傳為朱熹所編的《小學》（常作《小學書》）中的其中一篇。《小學書》前有朱熹作於淳熙十四年（1187）的序言，申言古時候有《小學》教導幼童灑掃應對等基本之道，「所

⁸⁶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刻本），壬集，頁27b。

⁸⁷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刻本），壬集，頁33。

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今全書不可見，所以「蒐輯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⁸⁸ 全書蒐集經傳篇章、先人名言與古人故事等，分為內外兩篇。其中內篇又分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分為嘉言與善行。《居家必用》的這個部分是從外篇嘉言篇中所收的九十一條中，選出十條與為官仕宦相關的內容。如其所收入的第一條，為《小學書》〈嘉言篇〉第二十九條：「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⁸⁹ 比起元刊本實用取向的吏學知識與出行占卜，明刊本新增且作為「仕宦」一集開頭的〈文公小學書嘉言篇〉，有較明顯的道德傾向，且隱然有「齊家—治國」的寓意。

本集後半段開頭是元刊本亦有的趙師俠〈拜命曆〉，隨後是擇日、〈百怪斷經〉、風占、鴉占、夢占等各種占法。這些內容放在「仕宦」底下，應該是因為流行於宋代的趙師俠〈拜命曆〉主要是為仕宦擇任官、出行之吉日良時所用，然後面許多擇日與占卜的內容部分與出行吉凶相關，但已不侷限於仕宦。總體來說，比起元刊本許多內容與官宦相關，這些內容在明刊本比重降低，從兩集半節縮到不到兩集。

明刊本從丁集到庚集是與宅舍、農桑、飲食等治物的相關知識。原來元刊本與家庭禮儀同在壬集的宅舍相關知識，與癸集的農桑牧養在明刊本合為丁集。而明刊本戊到庚集對應的部分在現存元刊本沒有留下，無法詳細比對其變化，然如果對照目錄，兩者大抵相同，惟在飲食方面的知識增加不少，且內容明顯的有蒙元特色。

而最末的王癸兩集則回到身體：「衛生」與「謹身」。王集「衛生」底下分為針對老人的〈養老奉親書〉、〈治諸病經驗方〉與抽白髮、辟臭蟲等〈諸雜方〉。其中〈養老奉親書〉在元刊本也收入，而元刊本丙集的〈衛生方〉因為沒有留存，不知道與明刊本〈治諸病經驗方〉、〈諸雜方〉的區別。而元刊本與〈養老奉親書〉同在己集的〈救荒辟穀〉、〈李氏食經〉則似乎在明刊本失去蹤影。癸集「謹身」則收入各種養生與修身的著作。養生部分新加入的是李鵬飛成書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養生秘訣〈三元參贊延壽之書〉。至於〈修養秘論〉(元刊本題為〈養生

⁸⁸ 朱熹輯，吳訥集解，《小學集解》(明成化七年刻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卷首，頁1-3。

⁸⁹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丙集，頁1；朱熹，《小學集解》卷七，頁187b-188a。《小學》引文說此條來自呂本中(1084-1145)《童蒙訓》，唯後世傳本多作呂本中《官箴》。見呂本中，《官箴》(民國武進陶氏據宋本景刊《左氏百川學海》012冊丁集上)，頁1。

秘訣》)、《太上感應篇》(明刊本題為《警心》)、《勸善錄》、《省心雜言》則與元刊本大抵相同。惟元刊本這些內容是與《薦饗儀範》、《袁氏世範》同樣置於乙集,但明刊本的乙集明訂為「家法」、「家禮」。這些混雜三教合一、養生果報等個人修養的內容,全部被移到全書之末。

總體來說,跟元刊本相比,明刊本不僅分類較系統,同時理學的成分也更明顯。元刊本正俗交雜,在司馬光的議論後面接著是新婦入門的天狗忌諱。然而明刊本則是正俗分界判然,雖然也收入雜揉佛道、風俗的內容,但在前兩集則是理學正宗。其所期待的讀者是遵循理學之道讀書求學、教育子嗣,以理學禮法治理家庭的家長。至於雜揉佛道的養生勸善,雖可實行但擺在最末。

這樣的調整反映在明代重刻的序文。田汝成為嘉靖重刻本寫序,依序略述各集內容:「其間所載訓幼端蒙之法,孝親敬長之儀,冠婚喪祭之禮,農圃占候之術,飲食殽饌之製,官箴吏學之條,攝生療病之方莫不畢,其信乎居家必用者也」,唯獨漏掉最末的修身勸善。書序結尾田汝成誇讚刻書的洪梗:「方泉君之居家也,祭祀極其誠敬,殽饌極其腆洗,待諸弟有恩,處父妾有禮。」能有這樣的家庭成就,「有得于是書居多」。因此「使居家者誠得是書而遵用之,則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矣。其功非小補云」。⁹⁰ 田汝成與洪梗交情深厚,常為洪梗重刻的宋版書寫序,因此此段有諛詞的成分。然而田汝成的說法也為洪梗刊刻此書提出理由。在宋儒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程序中,要先家齊才能國治。因此提供使之家齊的居家知識至為重要,而以理學讀書與禮法開先鋒的《居家必用》便是齊家的鑰匙。

明代中葉的一起事件,讓《居家必用》不只是家齊,甚至還可以是國治的工具。景泰二年(1451)川邊的棟巴罕呼宣慰使司掌司事都指揮同知科爾壘嘉勒燦曾要求賞書,他開列的書單有「《御製大誥》一部、《為善陰隲書》一部、《孝順事實》一部、《洪武韻》、《禮部韻》、《廣韻》、《玉篇》、《周易》、《尚書》、《毛詩》、《小學註解》、《士林廣記》、《居家必用》、《方輿勝覽》、《成都記》、《釋文三註》、《古文》一部」,而且態度「詞語甚恭,非若每時放肆,有見感戴聖恩,洗心向化之意」。巡撫四川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匡以唐玄宗賜書吐蕃之事,建議除了涉及地理的《方輿勝覽》與《成都記》,其他應該送給科爾壘嘉勒燦,「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⁹¹ 在這裡《居家必用》與其他書並列,都可

⁹⁰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寬文十三年松栢堂本),〈序〉,頁1。

⁹¹ 于謙,《忠肅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卷四,頁32a-33b。

以當作使蠻酋向化的工具。至於在晚明以後相繼出現的朝鮮與日本刻本，也表現出《居家必用》不僅作為實用的居家手冊，也被當成是理解華夏知識與文化的讀物。⁹²

比起結構較散亂，由元代建陽書坊刊刻的元刊本，明代源自內府本的重刻本結構較嚴謹，內容也更趨理學正統。是因為《居家必用》先正統化了才被官府所刊刻，還是因為官府的刊刻才正統化，並沒有明確的答案。棟巴罕呼宣慰使司索書的事情發生在較早的景泰年間，此時確定的是至少建陽書坊已有刻印《居家必用》，然而或許司禮監已經刊刻該書。但挑出《方輿勝覽》不可讀的四川官員，似乎已經可以肯定《居家必用》可以放在讓蠻人「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的指定閱讀書目當中。

從《居家必用》在明代出版與內容上的變化，可以看出來的是原本是元代建陽書坊商業化的家庭參考書，到了明代之後，官方刊刻的版本成為民間的範本。結果是內容更規制、更向理學正統靠攏。整體結構成為先是從個人讀書（甲集）、家庭禮法（乙集）到國家仕宦（丙集）的理學路徑，接著是治理事物的實用知識，最後再回到個人精神與身體的修養。後來的版本內容也更趨統一，但也同時與實用產生距離，成為正統的理想模範。

肆·結語

以往對書籍史或出版史的研究較重視宋代與晚明，對元代著墨較少。而如日用類書這種出版類型，雖然近來得到很大的關注，但焦點較集中在晚明的發展，被視為是晚明出版文化、商業文化中的一部分，儘管許多商業出版的現象在元代也觀察得到。⁹³ 而《居家必用》一書雖然為世所知，但因為明刊本經過重印出版，較易取得，因此即使知道此書在元代已經出版，但多以明刊本來討論，亦未曾在元代的出

⁹² 朝鮮刻本見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據朝鮮刻本重印）。

⁹³ 如 Shang Wei, "The Making of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5), pp. 63-92. 又近年日用類書之研究書目，可參考大澤正昭監修，松浦廣子編，〈明代日用類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稿〉（「科研費補助金『宋~明代日用類書の基礎研究』研究成果」，2019）。此書目標題雖為明代，但收入論著也有論及宋元者，惟總體來說明代為多數。

版史脈絡下討論此書以及此出版類型的意義。本文的目的即是將《居家必用》與家庭百科的出現放回其初次出現的歷史脈絡。

在元代建陽出版分類知識的商業出版文化下，各種新舊類書在建陽書坊間反覆增補、刻印。這樣的文化可以說是延續南宋以來的趨勢，不僅是文學，各種領域的知識也在十二到十三世紀間在官方與民間的參與之下，出現了不同規模的集成與整理。而到了十四世紀，眾多文本知識與文本知識的集纂，讓讀者需要一種可包羅各種分類知識的產品。⁹⁴ 在寫本時代收集分類文本知識可能是皇室的專利，然而雕版印刷與商業出版的發達讓博物洽聞之士可以擁有這種帝王般的享受。

《居家必用》在這樣的出版文化中產生，由書坊主導編成一部收集各類居家必用知識的彙編，讓讀者只需擁有這本書，就可以在茫茫文海中找到居家知識的關鍵文本。出現以「家庭」領域為對象的集成，亦與宋代以來家族的發展有關。經由科舉制度興起的階層為了延續其社會地位，在家庭領域的耕耘成為要務。培養下一代子孫的文化能力、家族成員的橫向聯繫與家族產業的延續與管理、欲聯繫家族成員而對祖先歷史的縱向追溯與確認儀式，都是宋代眾多討論童蒙、家法與家禮的潛在主題。這些討論讓蒙書、家訓與家禮指南在南宋都有長足的增進。出版分類知識的文化與家庭領域的發展，兩股趨勢的匯流在元代建陽產生針對家庭的分類知識集成。

這種出版類型在明代得到延續，特別在明代中葉商業出版更加發達後，《居家必用》設定的家用知識架構成為明代家庭百科依循的對象。曾被內府刻印的《居家必用》在民間持續刊刻，而明代中葉以來亦出現加入明代文本的家庭百科。以與《居家必用》書名只差一字的《居家必備》來說，此書的序托言元明之際的瞿祐(1341-1427)，但目前所見最早的版本都在明代中葉之後，其中也收入許多明代中葉之後的文本。全書各卷的標題依序是：「家儀、懿訓、治生、奉養、趨避、飲饌、藝學、清課。」⁹⁵ 除了少了仕宦吏學和多了藝學這個門類外，與《居家必用》大抵相同。明刊本《居家必用》關於仕宦吏學的知識或許是元刊本的殘餘，在明代中葉出版的家用知識百科則幾乎沒有這個部門。而《居家必備》除了在「家禮」卷中增加對相對「古禮」之「今禮」的說明外，更加添「藝學」等卷，收錄如屠隆等生活

⁹⁴ 關於資訊流通與分類知識的需求，參考 Ann Blair,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⁹⁵ 不著撰人，《居家必備》（讀書坊藏板刻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家居鑑賞的篇章，顯示了中晚明以來的風氣。到了晚明，除了居家知識的參考外，更出現許多標榜「士民備覽」、「四民使用」的類書。⁹⁶

《居家必用》與《居家必備》在分類架構上的差別顯現出所謂居家知識的彈性，在不同時代、針對不同讀者，被認為應該具備的居家知識也有所不同，如前述《居家必備》的晚明版本收入生活品味的知識，而晚清民初的家庭百科便會有講究科學、鑄造公民的內容。⁹⁷ 然而元代《居家必用》就出現的結構：「訓蒙、禮法、書筭、擇日、居宅、農牧、飲食、醫藥、養生」，在明清時期仍然得到延續。甚至在十九世紀福建山區農村家庭所收藏的刻本書籍也大抵落在這個分類之中。⁹⁸ 這或許顯現的是家庭領域需要的普遍性文本知識，在傳統時期，至少在宋代的近世宗族型態逐漸普及之後，大致上有穩定的輪廓。隨著相應文本的刊刻、流傳，這樣穩定的家庭知識結構得以延續下去。即使元刊《居家必用》在中晚明逐漸經典化，裡面包含的許多宋元之前的文本仍然繼續在明清刊刻。

另一方面，收入於《居家必用》與其他家庭知識百科的文本，如朱子《家禮》、〈袁氏世範〉、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法〉，以及各類農桑、醫方、養生等知識，都有其他的方式流傳，或有單行刻本、或收入文集、或收入於專門領域的集成、或有手抄本。而《居家必用》以居家作為挈領，把諸多不同類別的文本知識收集成一部。不僅收集編者認為各領域的「必用」知識，並常常加以改寫節縮。如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單行本有三卷之多，對讀書日程、各種書應該如何讀，有相當精細的討論。而在《居家必用》中將之濃縮成三頁，僅取其綱要。各種應酬文字的參考也常常是卷帙浩繁，如前述元泰定《啟筭青錢》即使已經是較精要的刻本，也有五十餘卷之多。然《居家必用》摘擷精要，以最簡捷的方式呈現，而只用了半卷的篇幅提供了日常應酬文字的參考。

讀者可能沒有經濟能力購買五十餘卷的《啟筭青錢》，或者沒有智識能力通覽朱子《家禮》中的討論，或者對專門的醫書、占卜書或《農桑輯要》沒有興趣。然而透過諸如《居家必用》這樣的精簡版的商品，這些分散諸處的文本知識以經過編

⁹⁶ 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

⁹⁷ 如 Joan Judge, "Sci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on Reader? Myriad Treasures and New Knowledg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in Context* 30.3 (2017): 359-383.

⁹⁸ Li Ren-Yuan, "Transmitting Textual Knowledge in Chinese Villages: Household Encyclopedia and Written Manuals" (paper presented at 21st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St. Petersburg, Russia, August 23-28, 2016).

輯剪裁的型態進入家庭。之所以仍要強調經過剪裁，是因為何者為「必用」、必用的知識要如何濃縮，也是經過揀選的結果。如從元刊到明刊，編者選擇突出了朱子《家禮》，而相較之下孫偉《薦饗儀範》在明清之後便少為人知。這些揀選的過程似乎經由商業機制，由書坊與編書者主導，然而也不可忽視其他力量的介入。如經過元代國子監刊刻推行的《讀書分年日程》收入明刊本，又如經過內府刊刻的《居家必用》取代了之前的各種版本，讓如今我們對其他編輯的安排幾乎一無所知。即使是市場取向的商業出版，其內容的取捨安排往往不僅有商業因素。

以往對《居家必用》的討論，因為對「日用類書」的看法不同，加以參照的對象不同，而對《居家必用》的社會定位有不同評價。如吳蕙芳認為《居家必用》比《事林廣記》和其他之前的類書更為實用，但主要對象仍為「士人」，不若晚明《萬寶全書》等「民間」，故稱後者為「民間日用類書」。宮紀子認為《居家必用》與其他許多同時期的出版品同為元代科舉文化的產物，主要針對對象為士人，並不「民間」。Elman 認為《居家必用》等新型態類書的出現是因為元代科舉不盛，書籍出版轉向吏員、平民等一般讀者，提供更實用的知識，是明代日用類書的前身。王正華則認為《居家必用》與晚明《萬寶全書》等日用類書的差別是前者主要對象為鄉紳，後者則展現更多城市的消費文化。⁹⁹ 這些對於《居家必用》以及相類出版品是否「民間」、是否「實用」，乃至於內容可否反映當時日常生活等討論，促使我們更進一步地思考書籍與社會之間的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從一本書的內容來認定其所收受者有特定的社會階層？首先，除了內容之外，影響書籍流通的還有開本、裝訂、價格等物質性條件；而不同時地具備購買書籍之經濟能力與閱讀書籍之文化能力的讀者也不一樣。此外我們亦不能忽略，作為一項商品，書籍或許有標的的消費者，但其流通則未必限定於此。如宮廷中流傳有裝訂較佳的《居家必用》，而任何可以負擔書籍之物質條件的人，不論具有功名與否、居城居鄉與否，都可以對這本書有興趣，以花錢或其他方式擁有製造不那麼精良的商業版本。因此如果我們對一個時代書籍流通的機制沒有更精確的通盤理解，根據書籍的內容、形式與物質構成，我們可以推斷的應該是生產者所針對的讀者。畢竟這樣的商品反覆銷售，代表背後有一定的讀者基礎。根據這些線索，元代的《居家必用》針對的是可以負擔書籍產品，且對教育、禮法、各種技

⁹⁹ 吳蕙芳，〈「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宮紀子，《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頁 400-401；Elman,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p. 134；王正華，〈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頁 19-20。

術等文本知識有興趣的讀者群。但若以此推定書籍是否屬於較抽象且相對性質的「民間」，恐怕反映更多的是討論者對「民間」為何的看法，如士人何以就不是「民間」、農牧等技術性的知識何以就與儒家經典或科舉指南不能相容。而書中收錄的文本知識，與其說反映了日常生活的實態，更不如當作是出版者提供的、具有一定共識之理想狀態的圖像，以及達到這種理想的指南，像是如何教出好的子嗣、種出好的作物，以及選擇好的旅行時間。這些理想狀態背後往往有相關的論述建構，乃至於具體的實踐方式。因此這些知識確實是「實用」的，但未必就反映出日常生活（誰的日常生活？）。對於研究者來說，這些書籍不是日常生活的呈現，而是一套理想狀態及其文化與思想的內涵，透過印刷文本傳遞至更廣大之社會群體的嘗試。

如果我們要討論某種文本、文本知識或隱藏在文本知識之後的文化與思想內涵如何流布，最靠近作者的一端或許只是其中一部分，靠近讀者的不同型態的中介文本在不同文化階層間或有不同作用。如許多欲透過文本知識了解祖先如何祭祀的讀者，管道未必是閱讀朱子《家禮》，而是透過家庭知識百科中的〈冠禮略〉、〈婚禮略〉、〈喪禮略〉、〈祭禮略〉，或是明清以來單行或收入《酬世錦囊》、由福建文人改寫之《家禮會通》等節縮本。讀者對各種正式人際關係的認識未必是經由學者的討論，而是透過社交應酬文字的格套指南來理解。其他諸如醫藥、占卜、農桑、養生、勸善果報等知識與相關概念，如《居家必用》這類中介文本勢必在傳播上有一定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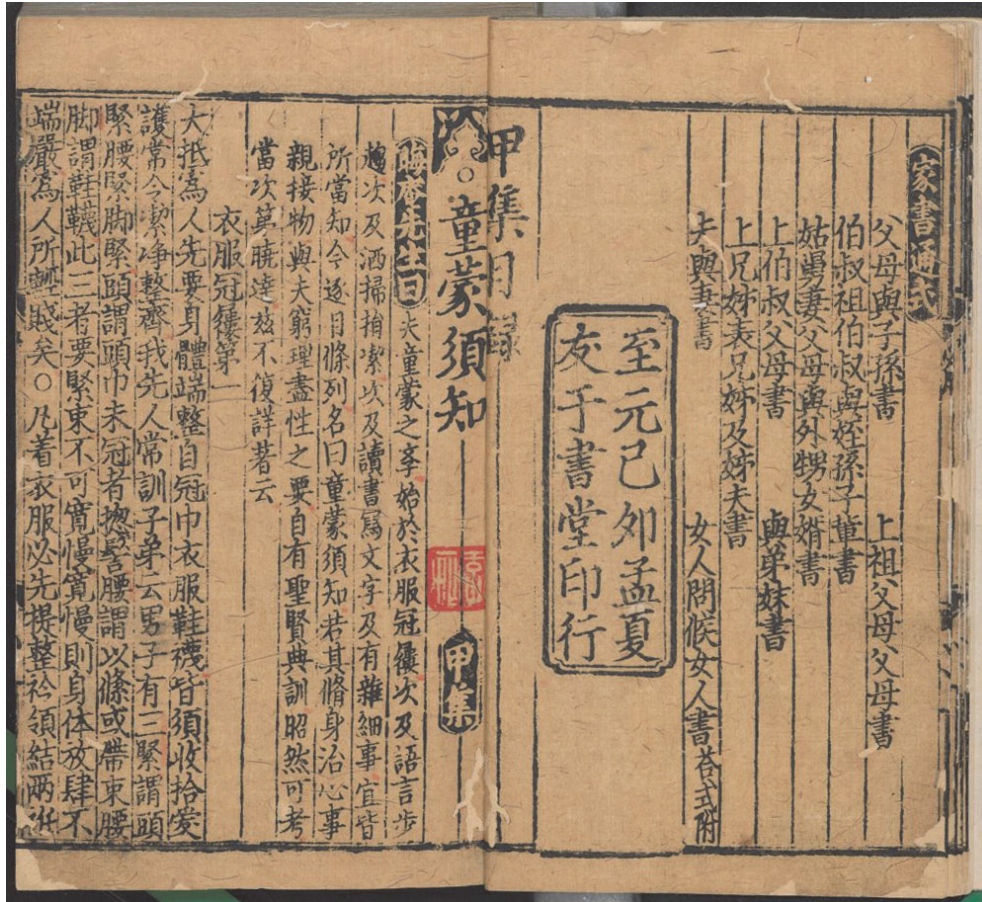
從文獻的一方來看，在《居家必用》的例子中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討論許多有影響力的宋代文獻，可以見到的最早刻本常出現在明代中葉之後，且多收入在叢書之中。因此元刊的《居家必用》與《事林廣記》便顯得彌足珍貴。如同本文最開頭引王重民的說法，認為它們最重要的意義在保留佚書。然而不僅是後世散佚的文獻，在明清時期流行的文獻，如袁采《世範》、〈王虛中訓蒙法〉、朱熹〈童蒙須知〉、趙季明〈族葬圖說〉等等，也是透過元代以來的類書得到廣播。甚至作者、書名與文本之間關係的建立，也是因這些集成類的書籍輾轉刊印而固定下來。以往在討論這些文獻在宋代的影響力時，常常較少考慮它們的流布方式（在宋代是以抄本、單行的刻本，還是收入其他合集中流通？），也常常直接以明代之後的刻本作為分析的對象（在宋代文本就已經是這樣子了嗎？）。儘管時代較後的文獻較有保留的可能，但透過《居家必用》的討論可以提醒的一點是，我們對這些文獻在當時影響力的評估，是否受到元代，甚至明清之後這些文獻所流通之樣態的影響？而這

些文獻及其背後負載的概念之可以產生影響力，或許是後世經過改編、節縮，而以家庭百科、類書等各種形式傳播後的結果。

從收受的一方來看，《居家必用》與這類家庭百科的出現可以帶來的思考是：宋元以來家庭型態的變化與這些商業出版品有多少關聯？《居家必用》呈現的無非是一種理想的家庭狀態，而且到明代之後，這樣的家庭狀態又更趨向理學化，如以理學的理想規範與教育子弟、依照重新肯定各類尊卑關係的原則書寫應酬文書、符合倫理的宗族成員關係、施行簡化但合乎古禮的禮儀。而這樣的正統家庭其實也不排斥擇日趨避、農桑實業、養生修真等知識內容，只是在明代被重新整理，放到理學儀範之後。《居家必用》呈現的家庭當然不代表當時的實況、其知識也未必全然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但這類書籍的成功代表有一群讀者想得到這些系統化的居家文本知識，甚至帶到自己的家庭當中，如以〈王虛中訓蒙法〉中的演示要求子弟作揖的姿勢，或依照〈族葬圖說〉修整開基祖的墳墓。當我們討論從宋元到明清家庭與宗族組織的社會史變化時，在群體利益的實際考量之外，《居家必用》、《居家必備》之後的家庭百科出版品，以及基於這些出版品之手抄與口傳的複製，或許就是提供他們各種行動的思想基礎、指導他們如何達到理想家庭的方針。

從這些角度來觀察，元代開始的這種結合家庭領域與類書形式的商業印刷產品，代表的是普遍性的家庭文本知識及其背後的家庭理想典型，藉由商業的力量傳達給更多的受眾。這些產品的出現意味著有一群知識階層需要這樣的普遍性知識，而簡化的表現形式又擴大了受眾的基礎。儘管這些知識未必能立刻付諸於實踐，然而這些經過揀擇、簡化過的文本，縮短了理論與行動的差距，而成為帝國晚期社會與文化，特別是明清以來宗族社會發展之思想基礎背後的重要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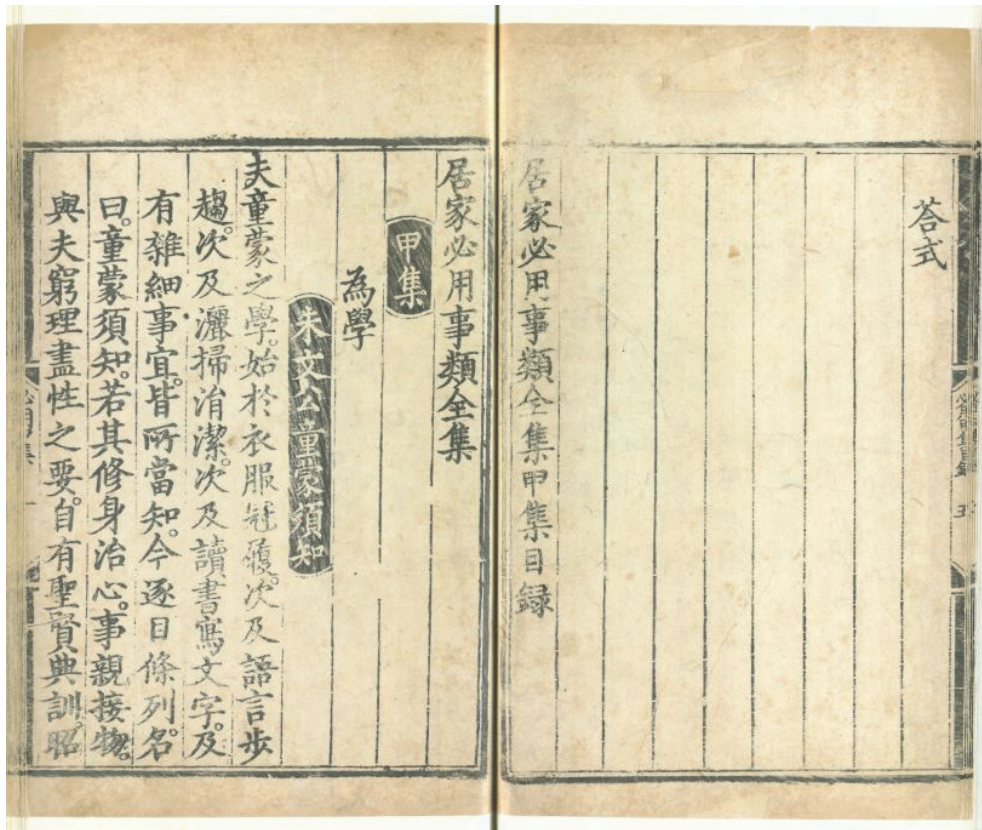
（本文於民國一〇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收稿；一〇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圖一：元刊友于書堂本《居家必用》（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圖二：元刊西園精舍本《事林廣記》（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圖三：明刊司禮監本《居家必用事類全集》（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92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丁申，《武林藏書錄》，收入《叢書集成續編》66，上海：上海書店，1994。
- 于謙，《忠肅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元至元五年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元刻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據朝鮮刻本重印。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石渠閣刻本，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17，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重印。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184，據隆慶二年飛來山人刻本重印。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明司禮監刊本，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全集》，乾隆三年德星堂刻本，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藏。
- 不著撰人，《居家必用事類附吏學指南》，京都：中文出版社，1984，據寬文十三年松栢堂本重印。
- 不著撰人，邱龐同注釋，《居家必用事類全集（飲食類）》，收入《中國烹飪古籍叢刊》，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86。
- 不著撰人，《居家必備》，讀書坊藏板刻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
- 不著撰人，《新編事文類要啟筭青錢》，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21。
- 不著撰人，《錦繡萬花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94冊。
- 永瑤等編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朱熹輯，吳訥集解，《小學集解》，明成化七年刻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 呂本中，《官箴》，民國武進陶氏據宋本景刊《左氏百川學海》012冊丁集上。
- 呂祖謙，《少儀外傳》，清守山閣叢書本。
- 紀昀等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晁瑣，《晁氏寶文堂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919。

李仁淵

- 袁采，《世範》，收入《筆記小說大觀》四篇，臺北：新興出版社，1974。
- 袁銛修，弘治《建陽縣誌續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176，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
- 陳元靚編，《新編纂圖增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18，據椿莊書院本重印。
- 陳元靚編，《增新類聚事林廣記》，西園精舍本，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 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9冊。
-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6冊。
- 楊守敬，《日本訪書誌》，收入《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2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 葉德輝，《卮園讀書志》，收入王逸明編，《葉德輝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第3冊。
- 葉德輝，《書林清話》，收入《叢書集成》第66冊，上海：上海書店，1994。
- 劉若愚，《酌中志》，青海山仙館叢書本。
- 劉應李輯，《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219-1221。
- 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1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9-941冊。

二·近人論著

王正華

- 2003 〈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1：1-85。

王汎森

- 1998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顏李學派為主的討論〉，《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245-294。

王柯

- 2016 〈《事林廣記》版本考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167-175。
- 2017 〈《事林廣記》源流考〉，《古典文獻研究》15：342-352。

王重民

- 1983 《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仝建平

- 2011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 2018 〈日藏元泰定重刊本《新編事文類聚要啟筭青錢》探微〉，《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2：83-86, 91。

- 2019 〈國圖藏元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筭雲錦》探微〉，《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55.2：10-17。
- 田建平
2003 《元代出版史》，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7 《宋代出版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 何淑宜
2007 《香火：江南士人與元明時期祭祖傳統的建構》，臺北：稻鄉出版社。
- 吳聿明
1987 〈太倉南轉村明墓及出土古籍〉，《文物》3：19-22。
- 吳蕙芳
2001 《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生活實錄》，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
2007 〈「日用」與「類書」的結合：從《事林廣記》到《萬事不求人》〉，氏著，《明清以來民間生活知識的建構與傳遞》，臺北：學生書局，頁 11-54。
- 李更
2012 〈《錦繡萬花谷》續書與《初學記》：南宋書坊「纂」書方式管窺〉，《古典文獻研究》15：288-319。
- 李致忠
2013 〈《錦繡萬花谷》編者為誰再探討〉，《新世紀圖書館》5：74-76。
- 周一良
1990 〈書儀源流考〉，《歷史研究》5：95-103。
- 岩本篤志著，何為民譯
2012 〈敦煌占怪書〈百怪圖〉考以杏雨書屋藏敦煌秘笈本和法國國立圖書館藏的關係為中心〉，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26-142。
- 胡道靜
1982 《中國古代的類書》，北京：中華書局。
2004 〈元至順刊本《事林廣記》解題〉，氏著，《中國古代典籍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60-178。
- 胡寶國
2017 〈東晉南朝的書籍整理與學術總結〉，《中國史研究》1：59-72。
- 荒木達雄
2017 〈石渠閣出版活動與《水滸傳》之補刻〉，《漢學研究》35.3：213-252。

李仁淵

馬學良

2014 〈明代內府刻書機構探析〉，《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9.3：42-46。

張文昌

2012 《制禮以教天下：唐宋禮書與國家社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秀民

1989 《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張新朋

2017 〈《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之儒學典籍殘片考〉，《敦煌吐魯番研究》17：49-57。

陳柳晶

2017 〈從元刊本《事林廣記》看元代幼學的發展：兼談《王虛中訓蒙法》之源流〉，《寧夏社會科學》204：175-179。

趙振

2014 《中國歷代家訓文獻敘錄》，濟南：齊魯書社。

盧冰

2017 〈魏晉至清代的書儀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論文。

謝水順、李珽

1997 《福建古代刻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謝輝

2017 〈《彈冠必用集》與宋代的兀日忌諱〉，《棗莊學院學報》34：1-9。

顧歆藝

2005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及相關問題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5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176-196。

大澤正昭

2010 〈『居家必用事類全集』所引唐・王旻撰『山居錄』について〉，《上智史學》55：111-140。

2015 《南宋地方官の主張：『清明集』『袁氏世範』を読む》，東京：汲古書院。

大澤正昭監修，松浦廣子編

2019 〈明代日用類書研究論文・著作目錄稿〉，「科研費補助金『宋~明代日用類書の基礎研究』研究成果」。

井上徹、遠藤隆俊編

2005 《宋-明宗族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 天野元之助
1975 《中國古農書考》，東京：龍溪書社。
- 佐伯富編
1941 〈吏學指南索引〉，《東洋史研究》6.4：312-330。
- 牧野巽
1980 〈近世中国の宗族〉，氏著，《中国家族研究》，收入《牧野巽著作集》，東京：御茶の水書房，第2卷，頁121-164。
- 宮紀子
2006 《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8 《モンゴル時代の「知」の東西》，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 酒井忠夫
1958 〈明代の日用類書と庶民教育〉，林友春編，《近世中國教育史研究：その文教政策と庶民教育》，東京：國土社，頁25-154。
2011 《中國日用類書史の研究》，東京：國書刊行會。
- 高橋文治
2006 〈書評：宮紀子著《モンゴル時代の出版文化》〉，《東洋史研究》65.3：505-514。
- Blair, Ann
2010 *Too Much to Know: Managing Scholarly Information Before the Modern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rokaw, Cynthia J.
1991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urke, Peter
1995 *The Fortunes of the Courtier: The European Reception of Castiglione's Cortegiano*.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Chia, Lucille
2002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th-1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Mashaben: Commercial Publishing in Jianyang from the Song to the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Paul Jakob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284-328.
- Darnton, Robert
1995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ew York: W.W. Norton.

李仁淵

Ebre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Patricia)

- 1984 *Family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 Yüan Ts'ai's Precepts for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6 "Early Stages of Descent Group Organization." In *Kinship Organiz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000-1940*, edited by Patricia Ebrey and James Lee Wat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16-61.
- 1991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Elman, Benjamin

- 2007 "Collecting and Classifying: Ming Dynasty Compendia and Encyclopedias (*Leishu*)."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Special Issue: 131-157.

Judge, Joan

- 2017 "Science for the Chinese Common Reader? Myriad Treasures and New Knowledge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cience in Context* 30.3: 359-383.

Li, Ren-Yuan

- 2016 "Transmitting Textual Knowledge in Chinese Villages: Household Encyclopedia and Written Manuals." Paper presented at 21st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St. Petersburg, Russia, August 23-28.

Shang, Wei

- 2005 "The Making of Everyday World: *Jin Ping Mei cihua* and Encyclopedia for Daily Use." In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 edited by David Der-wei Wang and Shang Wei.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p. 63-92.

Soll, Jacob

- 2005 *Publishing The Prince: History, Reading, 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Jujia biyong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Family Use*) and the Birth of the Household Encyclopedia in China

Ren-Yuan L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ost scholarship discusses Chinese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in the late Ming context; however, *Jujia biyong*, or *Necessary Knowledge for Family Use*, published in Jianyang during the Yuan, is the earliest extant commercial imprint that classifies textual knowledge for the family. This new genre made “family” a field of knowledge, categorized selected texts and printed them as a commodity. This new genre in the Yuan resulted from two trends that began in the Song. First, more encyclopedia and reference books were printed by commercial publishers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irculated texts and the growing market for classified textual knowledge. Second, textual knowledge related to family was in demand to educate descendants and maintain family or lineage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rise of a new social stratum. Experienced reference book publishers in the Yuan dynasty district of Jianyang, therefore, created an encyclopedia of classified and simplified family knowledge to make these texts easily accessible to zealous readers.

During the Ming, in addition to commercial publishers, *Jujia biyong* was also reprinted by the Directorate of Ceremony at court. The court edition was soon reprinted and widely distributed by commercial publishers, replacing various editions dating from the Yuan, and became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is title. This standard edition was well-structured and provided a Neo-Confucian image of the ideal family. While the “household encyclopedia” genre flourished during the late Ming, *Jujia biyong* kept being printed, but publishers did not add new materials and kept its Song-Yuan contents intact. Instead of a manual for practical use, *Jujia biyong* became an authoritative source of family knowledge after the late Ming.

The formation and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created by *Jujia biyong* was inherited by later household encyclopedias. During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 the textual knowledge

李仁淵

and the family ideal disseminated by these manuals became an important intellectual foundation for family and lineage practices throughout China.

Keywords: *Jujia biyong*, household encyclopedia, book history